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西安地方志



2015 · 6

(总第237期)



近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落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好“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要求，采取实地查看、座谈交流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征求意见。



▶ 12月7—8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曹永辉，副主任姚敏杰、张帆，副巡视员王莹，率领相关处室同志分别赴户县、周至、阎良等区县调研地方志工作。图为在临潼区调研。



11月26日，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2015年《西安年鉴》培训会议”召开。市志办副主任、《西安年鉴》常务副主编姚敏杰出席会议并做动员讲话。

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原主任、编审张卫东就年鉴撰稿进行授课，《西安年鉴》副主编姚文东就年鉴条目编写进行培训。

目 录



西安地方志

2015·第6期

(总第237期)

陕新出连内印字第00016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历代名人与西安

阿罗本——基督教来华传教第一人 (3)

学术交流

西安卧龙寺得名不在宋初,亦与皇帝无涉
..... 王民权 (5)

人物春秋

西安抗日名将——左协中 (9)

史料钩沉

为何只有共产党能坚持敌后抗战 (11)

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收复台湾始末 (15)

西安何家村遗宝之谜 (17)

西安风情

西安城门趣闻(十四)——尚俭门 (21)

华严寺——佛教华严宗的发源地 (22)

流年:高桂滋公馆记忆 张艳茜 (23)

风雨人祖庙 鹿志锋 (26)

我们的村落

北张村——三位老人历时十年写村史 (29)

周宋村——感恩桑梓写村志 景浩学 (30)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高陵民间花灯纸扎技艺 富小云整理 (33)

文史拾趣

纪晓岚妙语解尴尬 (35)

古代皇帝谥号漫谈 (36)

中国史上孩子多的七大皇帝 (37)

志鉴动态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采取多种方式征求意见
..... (39)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展党建帮扶·文化下乡活动
..... (39)

2015年《西安年鉴》培训会议召开 (40)

《西安年鉴》(2015卷)出版发行 (41)

《北张村纪事》正式出版 (41)

《周宋村志》出版 (41)

知识窗

“五经”何以成为汉代的普及读本 (42)

小姓易遭淘汰 (43)

“书香门第”中的“书香”是什么意思 (44)

魏晋以前没有“脸”字 (44)

中国最早的史书 (44)

历代诗人咏长安

卖炭翁 (唐)白居易 (45)

解字

“色” (8)

“创” (20)

名句欣赏

【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国益大】等
五句 (14)

文苑

兴会在秋季 田周民 (47)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曹永辉

副主任:姚敏杰 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富小云

高 鹏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姚敏杰

副 主 编:高长安 宋亚颖

责任编辑:宋亚颖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109号市政府
大院26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http://www.xadqw.cn/diangzhinew/
index.jsp](http://www.xadqw.cn/diangzhinew/index.jsp)

E-mail:changannan6861@sohu.com

电话:029-86788731

阿罗本—— 基督教来华传教第一人

阿罗本是已知的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基督教教士。阿罗本原是叙利亚人,以后到了波斯,在那儿受到景教的熏陶,领受圣秩,成了司铎。唐贞观九年(635)从波斯到唐帝国京城长安,是大秦僧侣入中国的第一人。

阿罗本到长安时,唐太宗特别派遣宰相房玄龄,率领仪队到长安西郊以国礼欢迎,而且直接迎入宫廷。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原因。

一是因为阿罗本在西域边境上展开了传教活动,极受当地人士爱戴、尊敬,名气很大,自然也会得到唐政府的关注。二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这一时期,正值中国的太平盛世:经过唐初的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举国富庶,百姓安居乐业,文化昌明;但是中原之外的边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依然并不安定。伊斯兰教徒又不断地与西南亚洲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及波斯等地的基督教国家发生冲突。战争随时都会发生,很可能会威胁中国本土,唐太宗为防止边界突厥民族的入侵,常常利用通婚和商业上的来往交流,缓和紧张局势,确保当时中国通往欧亚各国交

通要道——丝绸之路的畅通。这时得知景教要派传教士来华,自然高兴无比。这一方面可以透过景教传教士以结识更多基督徒,同时也可请他们充当翻译员,有利用与伊斯兰教国家的交流。

阿罗本来华时,携带了 530 部经书,其中有一部分后来翻译成了中文,唐太宗曾亲自审阅,并听其宣讲教理。唐太宗发现阿罗本所带来的经书及其所讲的基督教理论不仅内容丰富、言之有物,而且在中国又自成一家之言,对治国安邦会很有益处,于是就给阿罗本及随从人员留华传教的权力。此举为景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促使其在中国迅速发展。

在传教期间,阿罗本还得到宰相房玄龄、大臣魏徵等人的协助,进行得很顺利。阿罗本来华后,建立景教寺,翻译经书,将福音真光带到了华夏。3年内,陆续由波斯东来的传教士,增至二十一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修院组织与波斯、叙利亚的景教相似,同属于隐修院传统,奉巴格达宗主教为领袖;在中国教长之

● 历代名人与西安 ●

下,分为几个教区,由副主教管理;并有司铎负责礼节、布施、教育等事;在较大的寺院设寺主和理院。

阿罗本传教工作除了讲授景教教义外,还很重视宗教生活。在讲授教义方面,以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作为出发点,来说明救赎的真理,并用圣洗来涤除皈依基督的原罪。重视诵念日课,每日有七个固定时辰的礼仪朝拜,配合着磬声显出有规律而虔诚的心,在礼仪过程穿着僧人服装,留着胡须,削掉头发,保存了东方隐修士的礼规。除了这些礼仪性的行动外,在生活上也表现出贫穷、受斋、施舍、为亡者祈祷等精神,并在主日献祭、告解、涤除心灵罪污,所以吸引了部分中国人士的注意及重视,渐渐地也有中国人加入。

不过传教事业真正开始萌芽,当在贞观十二年(638)秋,也就是阿罗本抵长安的第3年。那时唐太宗亲自下诏谕令景教在国内可以自由公开传布,并且在京师长安的义宁坊地方,兴建景教寺,同时把自己的肖像转塑在景教寺的墙壁上。

650年高宗继位,对景教更加提倡,敕令在全国各州建立景教寺,并且仍旧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这时的景教,已经传遍全国各大城市。不久,阿罗本升为中国景教的教长,长安也成了中国景教的中心。除译经之外,还建立大秦寺,最具代表性的大秦寺位于西安市周至县城东南20公里的终南山北麓,是历史上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寺院之一。

1625年,长安发现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上有“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的记载。阿罗本的贡献和影响很大。当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发现后,曾引起国际轰动。景教碑被世界考古发现史列为“世界四大名碑之魁”(景教碑、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所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崖碑及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作为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慕名前来参观、考察及研究的专家、学者络绎不绝。但关于阿罗本的记载太少;宋人宋敏求《长安志》中,已讹为“阿罗斯”,且仅仅称“胡僧”。



周至境内的大秦寺古塔

西安卧龙寺得名不在宋初， 亦与皇帝无涉

◎ 王民权

全国佛寺以“卧龙”名寺者夥(huǒ)矣，而西安卧龙寺最称悠久，夙以名刹卓立于佛教丛林之中，晚近尤以康有为所演“圣人盗经”和其主持朗照大德“文革”罹难而轰动一时。其创始时间，有说隋朝者，有说汉灵帝时者，不尽一致，而其寺名之来，清代以降亦即向称两歧。一说宋太祖赵匡胤亲赐。如清道光十年(1830)《重修卧龙寺记》碑记载：

昔汉明帝梦佛入中国，悦之，因建祠南郊而致祭焉。灵帝时敕赐创修为寺，于其中讲《楞严经》，上为国家保平安之福，下为生民致安乐之庥，遂题其寺曰福应寺，而神之禋祀至此隆，人之崇奉至此多矣。厥后绵延至贞观十一年(637)，重修之，有吴道子绘画观世音神像一尊，镌之于石，供之于寺，遂名曰观音禅院。又后宋太祖临其寺，寺僧与谈甚相得，后遂数至，因其僧春秋长眠，太祖改之名卧龙寺。由兹以来，神之感应何代不彰？神之礼祀何代不盛哉！

清同治七年(1868)《卧龙寺重修碑记》记载：

宋初有禅师，法名卧龙，太祖曾幸此寺与谈佛法，机缘相契，以为先兆，遂改为卧龙寺。

民国高鹤年《名山游访记》之《陕西诸山游访略记》记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农历)八月初三

日，进安远门即北门。五里许，柏树林陆海里卧龙寺，有吴道子画观音像，故名观音寺。宋太祖曾临此，改名卧龙寺。

民国曹弃疾、王蕪《西京要览》之《西京胜迹》记载：

卧龙寺 在柏树林。建于隋代，旧名福应禅院。唐以院内有吴道子所画观音像碑，改名观音寺。宋朝有僧名维果者，长卧其中，人以“卧龙”呼之。宋太祖尝幸此寺，与谈佛法，机缘相契，以为先兆，复更名为卧龙寺。

一说宋初太宗赵光义所赐改。如民国陈光珪《西京之现状》之《西京之名胜古迹》记载：

卧龙寺 在文庙东。创于隋代，初名福应禅院。唐以寺内有吴道子画观音像碑，改名观音寺。至宋，有僧名维果长卧其中，人以“卧龙”呼之，故宋太宗又更名为卧龙寺。

民国西京筹备委员会《西京指南》之《城郊及四郊古迹名胜》记载：

卧龙寺 在文庙之左柏树林街。创于隋，初名福应禅院。唐改为观音寺，因寺内有吴道子画观音像碑，故名。至宋有僧名维果长卧其中，人以“卧龙”呼之，宋太宗遂命改今名。

民国倪锡瑛《西京》之《西京城区胜迹志》记载：

卧龙寺 在文庙的东面。始创于隋朝，最

●学术交流●

初名叫福应禅院。唐朝时改名叫观音寺,因为当时有一位大画家吴道子曾手画观音像,刻石立碑在寺内的缘故。到宋朝初年,有一个和尚叫维果,长卧在寺内,时人都称他叫“卧龙”,因此宋太宗便更名叫卧龙寺。

民国王望《新西安》之《西安附近名胜》记载:

卧龙寺 在文庙之左柏树林街。汉灵帝时建,初名福应禅院。唐以寺内有吴道子所画观音像,改名观音寺。宋时有高僧名维果者,长卧其中,人以“卧龙”呼之,太宗遂名为卧龙寺。

民国王斌《长安一月》记载:

卧龙寺在文庙东北……据说寺建于汉灵帝时,又说自隋朝创始。初名福应禅院,到唐时因吴道子画了一幅观音像在那里,刻石立碑,因而又叫观音寺,宋朝初年,有一位高僧维果,长卧其中,时人都呼为“卧龙”,宋太宗因而赐名为卧龙寺。

两种说法,均涉宋初皇帝,区别仅在太祖、太宗而已。可是仔细分析,两说似都有点牵强。因为以前说而论,乍一看颇觉传奇,稍一想便生荒唐之感一封建专制社会,皇上乃“真龙天子”,龙是封建皇权之象征,通过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怎么可能慷慨到以之赠人,而且是赠给一位出家之人呢?道光《重修卧龙寺记》的记载,纯系穿凿附会也明矣。同治《卧龙寺重修碑记》的作者,应该是看出了它的破绽,有意补缀以自圆其说,但却毕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的判断,高氏《名山游访记》和曹、王二氏的《西京要览》步其后尘,拾其牙慧,同样无助于事实的改变。所谓太祖和维果“与谈佛法,机缘相契,以为先兆”而亲改寺名云云,一看就知道是其私逞臆想的杜撰,

不值一哂(shěn)。而以后说而论,太宗的皇位是怎么来的?“烛影斧声”至今仍是个疑案,他可能以龙许人吗?前说面临的问题,这里照样存在。而且不仅如此也,说宋初有僧人维果长卧寺中,人以“卧龙”呼之,太宗便更其寺名为“卧龙”,这故事也编得太糙了点:佛教丛林,奇异无限,偶或出现个有个性的僧人,原不是稀罕之事;卧龙寺以关辅名刹幸而有个维果这样性喜长卧的和尚,不见得就是天方夜谭。可维果谁耶?人以“卧龙”呼之,褒贬不详,太宗位居九五之尊,竟能因此一呼而亲改寺名,衡以常理,你我自扪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必要吗?有宋一代,高僧辈出,维果倘如诸家所言,备受太宗青眼,何以名不见乎各种史籍之中,《宋高僧传》中,也不一见其踪迹呢?所以,尽管此说似是对于前说的修正,甚至前说后来几为此说淹没或取代,但其蹈空虚构不足令人信服,仍是客观存在之事实。

然则这样一个说法,为何还能长期流传,至今尚有人信之不疑呢?窃意原因有二:其一,史载其寺中曾藏有梵文的“唵”字碑一通,系该寺传戒沙门惟(维)果所立,其上有宋太宗的赞偈;其二《秦藩碑记》记载:“(卧龙)寺在隋为福应禅院,唐名观音寺,宋太宗更名卧龙。明正德十六年重修”可是关于前者,说者只想着碑上有太宗的赞偈,有维果这个和尚,却忽略了此碑为“熙宁十年(1077)八月十六日”所立,而熙宁是宋神宗赵顼的年号,太宗和惟(维)果悬隔真宗(赵恒)、仁宗(赵祯)、英宗(赵曙)三朝,熙宁十年距太宗最后当朝的淳化五年(994),前后相差80多年,根本就没有交集的机会;关于后者,说者只看到“宋太宗更名卧龙”一句,却没有注意到上文还有“寺在隋为福应禅院,唐名观音寺”两句,弄懂

“宋太宗”之后应属隐省一“时”字，而其意绝非是说宋太宗直接为其改名或赐名，结果就成就了现在这个局面。殊不知，清康熙《陕西通志》已说得十分清楚：

卧龙寺 在陆海坊四牌楼南。有吴道子画观音像及佛足迹碑，初以像名观音寺。宋有僧维果长卧其中，人以“卧龙”呼之，故名。

意即此寺之所以冠名“卧龙”，盖以其寺宋时有僧人维果以惯于长卧而被人呼以“卧龙”，寺名亦因之而发生了改变。可见此事说千道万，其实与宋太宗本人和太宗时期，均无瓜葛。因为太宗本人也许来过该寺，也许给该寺写过赞偈，但他既与维果和尚不会有所交集，自然与此寺之得名“卧龙”，也无必然的联系；大家众口一词，都说寺名是因寺僧维果而来，但维果却是熙宁僧人，并非宋初之人，此寺之得名自然也不会太宗时期。道理不难理解，“豇豆一行，茄子一行”，谁都明白这根本就黏(音 rán)不到一起。因此，说此寺在宋代因为维果和尚而得名卧龙，这或许是个事实，但是若说宋太宗时因为维果和尚而得名卧龙，则显然有违情理，说宋太宗亲自为其改名或赐名，更是不可理喻。遗憾的是，这个在清初原本简单清楚的问题，后来竟变得复杂而扑朔迷离起来。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嘉庆《咸宁县志》在载记此寺的时候，既载了康熙《陕西通志》的说法，又载了《秦藩碑记》的说法，使其两说并存，而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仍然坚持“至宋有僧维果长卧其中，人以“卧龙”呼之，宋太宗更名卧龙寺”的观点(志卷一百三十一《古迹一》)，《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却一字不涉其寺名之来历，有意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为志犹史也，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本文上引

各家各书的诸种说法，究其根本，都是直接发端于此，或者从这里导引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讲，在“众人皆醉”的情况下，民国《西京指南》的作者王荫樵先生，兀自能保持一份罕见的清醒，在书中留下“卧龙寺在县治东南开通巷西口内。汉灵帝时创建。内有宋刻大藏经全部，及石刻吴道子画观音像及佛足迹碑。初以像名观音寺，缘宋时有高僧维果者长卧其中，人以“卧龙”呼之，“故名”这样的记述，实在难能而可贵，相比之下，新编《明清西安词典》和《碑林区志》记载此寺时，一个写作“太宗时高僧惟果为该寺住持，终日长卧，人称卧龙和尚，因而定名卧龙寺”，一个写作“太宗时高僧维果为该寺主持，终日静卧寺中，人称‘卧龙禅人’，因而更名卧龙寺”，依然因袭此不经之旧说而不自知其谬，反倒让人倍觉气短，不禁怅然瞠目而不知所云。

2014年10月29日于介然斋

附记：客岁撰著此文，自信真理在握，所断不谬，但是对此问题之究心，却未敢以时光流逝而稍懈。何正璜先生，原陕西省博物馆研究员，文物专家也，1940年代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唯一女性成员也。其《西北考察日记》，有两处提及其伉俪（其丈夫即考察团长王子云先生）当年造访斯寺所得。一次在1941年1月19日，记曰：“文庙之东，有卧龙寺。建于隋初，名福应禅院。至唐改名观音寺，因寺内有吴道子所绘观音碑故。至宋有僧维果，日卧其中，人以卧龙呼之，宋太宗因更其名为卧龙寺。”与拙文所示第二种说法，略无出入。一次在1941年1月27日，记曰：“抵卧龙寺，入后

●学术交流●

殿见一碑，知此寺创自汉灵帝。宋太祖微时尝寓宿，视其额曰‘卧龙’，以为吉征，践祚后特别修建。”又似与文中所提道光、同治二碑，不无渊源。其将斯寺太祖的关系，确定为“太祖微时”，“微时”二字，堪称对道光、同治两碑“又后宋太祖临其寺，寺僧与谈甚相得，后遂数至，因其僧春秋长眠，太祖改之名卧龙寺”和“宋初有禅师，法名卧龙，太祖曾幸此寺与谈佛法，机缘相契，以为先兆，遂改为卧龙寺”两处文字，最切肯綮的解读，颇足以点醒迷茫中人。原来，斯寺的得名，可能真的不在宋时，其时宋朝尚未成立；斯寺的得名，可能真的与宋太祖有关，但彼时太祖尚在“微时”，也就是说，还没有当皇帝，还在争取当皇帝的路上。所谓宋时，所谓宋太宗和宋代维果和尚云云，

都显然只是无从稽考的游谈附会而已。因为，不管其到底是原来的寺僧法名“卧龙”或人称“卧龙”，还是太祖“尝寓宿”于此或如《日记》所说斯寺的门额原来就颜以“卧龙”，总之在潜未登基之前的太祖看来，于他都是吉兆，而其心中真正的“卧龙”，则显然只是他自己；同时，也只有将时间锁定在这个时候，一切才都说得过去，不至于扞格不通。所以，原文我所持“卧龙寺之得名不在宋初，亦与皇帝无涉”的观点，原则上并无不妥，只是当时面对诸种歧说，心中有疑而剖判乏术，惭未如先生一样深得要领，一语破的，绕来绕去，未免显得繁复了点。

2015年11月16日于介然斋

·解字·

色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个“色”字本为会意字。甲骨文①的左边是“刀”，右边是一个跪着的人。唐兰先生认为“色”是“断绝之义也”。②是小篆的形体，“刀”讹为“人”。③是楷书的写法。

《说文》：“色，颜气也。”恐不妥。“色”的本义为“断绝”，实际上也正是“绝”字的初文。《说文》释“绝”为“断丝也”。后世“色”字的本义由“绝”字来代替，而“色”被借为“颜色”义，如《后汉书·仲长统传》：

①

②

③

“目能辨色。”由“颜色”引申为“怒色”，如《战国策·赵策四》：“太后之色少解。”也就是说：赵太后的怒色稍稍缓解了一些。至于“去声色，禁嗜欲”（《淮南子·时则训》）中的“色”，那是指“女色”。原话的大意是：要远离音乐和女色，禁止嗜好和贪欲。

请注意：在现代汉语里，“色”有时也可以读为 shǎi。如：掉色、褪色。另外，有一种赌具叫“色子”，如“掷色子”、“打色子”等，也应读作 shǎi。



西安抗日名将

——左协中

左协中，又名左世允，清光绪十五年（1889）农历十月十五日生于长安县（今长安区）韦曲东兆余村。少年时曾在银匠炉学艺，16岁考入西安陆军小学。两年后升入陆军中学，上学时阅读了一些反清驱洋的书刊，受到革命党的影响，并参加过多次秘密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和同学一起参加了张凤翔、钱鼎等领导的西安起义。民国成立后，首批被选派到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在驻防陕北神木、府谷一带的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队中供职，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26年升任团长，兼中部（今黄陵）、宜君、铜川、耀县警备司令，驻防铜川，第二年升任旅长。当时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战情甚急，左协中速与杨虎城部取得联系，适时布防，有效地牵制了敌人。抗日战争爆发，左协中任国民党骑兵第六师师长兼伊克昭盟游击纵队司令，亲临前线指挥与日寇作战，多次粉碎日寇渡黄河、占府谷、夺榆林的企图，确保了榆林、延安的安全。为了支持八路军抗日，左协中在绥蒙地区派河防营长董正谊赠送给八路军四部电台，有力地支持了大青山游击队的抗日斗争。同时他还派船运粮食、盐巴、布匹等紧缺物资，接济在山西保德县驻防的八路军许光达部队。1942年，左协中担任国民

党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军长高双成逝世，他接任军长职务直到解放。

在抗日战争中，左协中率领官兵与日寇浴血奋战60余次，粉碎了日寇以陕北为突破口妄图侵略我国大西北的企图，为保卫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与敌最壮烈的战斗有三次。第一次，伊东战役。1938年4月间，日寇指挥伪蒙军第四、第八师2000余人，配备装甲车4辆、汽车3辆、大炮12门，企图消灭我伊东抗日游击队，以占领控制伊盟地区，为侵略陕西和大西北打开通道。战事危急，左协中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当即指挥伊东纵队第三支队及地方团队，向北急进迎敌。接着他率领自己的二五六旅将士，火速赶往伊东支援，从背后向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势。经过激烈战斗，敌人大部分被歼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遏制了日寇西进的气势，竭力保护住了此地的成吉思汗陵墓；第二次，新城战役。新城在陕北黄河西岸。1939年1月20日，日寇崔田部队率步、骑、炮兵2000余人，在坦克装甲车和10门大炮掩护下，由包头经磴口，踩冰偷渡黄河，向新城进犯。获悉这一紧急敌情后，左协中立即电令张志琳率领五一五团奋力迎敌，当日拂晓，敌人猛扑几次均被击退。次日，日军在飞机大炮

●人物春秋●

的掩护下,又猛烈进行了几次冲锋,仍被张部击败;第三次,新民堡战役。1940年1月22日拂晓,包头日军岗布派骑兵、步兵2200余人,分三路暗渡黄河偷袭左协中部队的伊东驻地新民堡。在敌我决战的关键时刻,连长李明等私自决定撤离阵地,左协中得知后,立即召开支队长会议,追查阵地失守的原因,遂将临阵逃跑的李明等两人枪毙,以正军法,极大地激发了将士们英勇杀敌的士气。接着,他立即调动兵力收复失地,激战半天,日军败逃,新民堡失而复得。

他的家乡东兆余村,过去没有学校,孩子们要到距本村五里以外的蕉村上学。他1947年清明节回村祭祖,就召集乡邻,劝众兴学,商量建校事宜,村民积极响应,并成立了建校董事会,回榆林后还捐献薪水,使学校终于在预定时间竣工。村民纷纷送子女就近入学,时有学子300余名。众乡亲十分感激,在学校为左协中矗立了捐资兴学纪念碑,碑联为:卫中华名垂青史,建学校功润桑梓,碑额是:高山仰止。

1949年左协中审时度势,顶住上下左右的压力,毅然决定起义,适时派代表赴延安谈判起义事宜后,于1949年6月1日在榆林正式宣布起义。为此,左协中将军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了致敬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又向左协中将军发了贺电。

1949年7月11日上午9时,左协中等率领官兵,在飞机场迎接西北局领导人曹力如、张达志等,军民共庆榆林和平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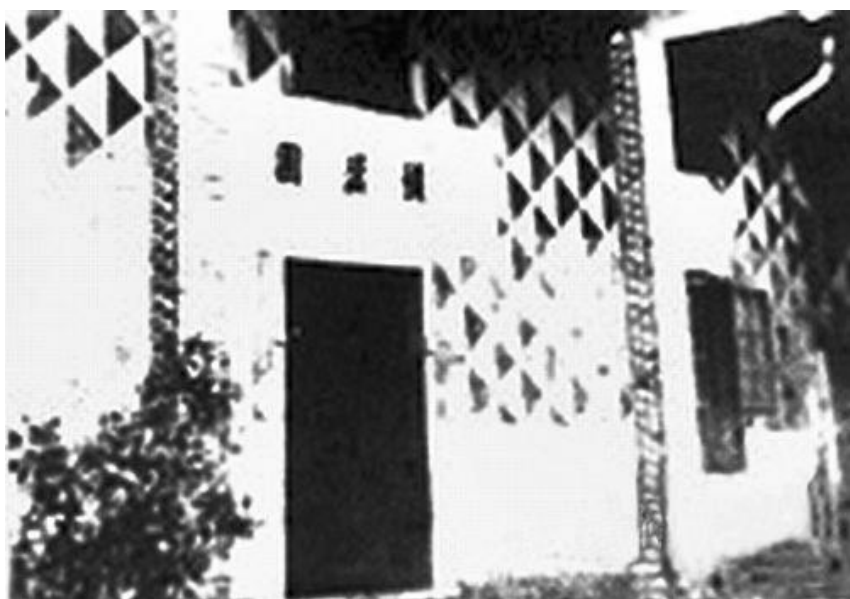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左协中应邀赴京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

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参与讨论制定《共同纲领》,还出席了开国大典。

解放后,左协中历任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安市政协副主席。

1950年10月8日,中国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左协中义愤填膺,将当时正上学的小儿子左鸿谋毅然送上朝鲜战场。后来,《群众日报》以《左协中将军送子参军》为题,表扬了他抗美援朝的感人事迹。时隔半年,他看到美帝在朝鲜愈加疯狂,又决定将在西安玫瑰女中求学的女儿左励勤动员去参军,他的这一行动,对当时全市抗美援朝工作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在任乾县土改检查团团长期间,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视察土改深深地教育了我》的调查报告。并以此为题在西安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作了发言。接着《群众日报》和《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他的讲话,在当时土改工作队中引起了很大轰动。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左协中深入西安市灞桥区,重点考察了15个农业社,用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和深切感受,向西安市各机关和社会各界大力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并撰写了《生动的事实打破了以往的疑问》的体会文章,刊登在195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上。编者按语说,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左协中用自己调查的材料说明合作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对西安、陕西乃至全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1960年8月17日,在列席西安市人代会期间,左协中因高血压突发,不幸逝世,享年71岁。



1939年，国共在南岳衡山合作开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

为何只有中共能坚持敌后抗战

当年国家虽大却力量衰弱的中国想对抗小而强的日本，只靠正规战必败无疑，对这一点国共双方都有认识。日军大举深入中国内地后，总数不过5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以敌后为发展方向，国民党也向敌后派出过50万军队。最终结果是，8年后共产党的军队发展到百万之众且建立了1亿人口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或灭或降或逃，所剩无几。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

共产党最早认定“到敌后去”的发展方向

游击战是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这一点在近代世界各国已有公论。纵横西欧无敌的拿破仑被西班牙的游击战争拖垮，大英帝国被南非的布尔游击队困扰得无计可施，只好妥协，都是西方军事家推崇的战例。谈起

在近代中国进行的游击战，中国共产党自然是顶级大师，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作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当权者，则一向只注重正规战。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蜂起后群龙无首的各路义勇军也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能坚持长年游击战。后来在淞沪抗战、长城抗战时，国民政府只进行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军节节入侵，心存忧患的中国人无不思考作战的对策。如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以对抗日本，这显然力不能及。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急于要红军改编并出师前线。蒋介石认为共产

●史料钩沉●

党跳到敌后打游击能配合正面战场，且更易被日军围歼，于是两党达成了协议，抗战期间共产党以敌后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

八路军出师晋东北首战平型关之后，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游击战。如在 115 师政委聂荣臻指挥下，八路军 2000 人深入晋北和冀西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并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该部在几个月里扩大到 4 万人。晋察冀边区这一“模范根据地”的建立，证明八路军在日军后方完全可以站住脚，并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当时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伪军、散匪再搜集国民党军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随后，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为它的新前线。

国民党军学不了游击战

国民党当局后来转向重视游击战，主要是由于战局转变。“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一个新战场，并抽调全国 1/3 以上的正规军在狭小的战场相拼。蒋介石当时在内部说过，这一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干预。英美却未以强力阻止日本，苏联也未出兵，国民党上层就不能不考虑战争的持久性。

1938 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战略，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当时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白崇禧却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属“杂牌”武装，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

武汉失守后，1938 年 11 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了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并决定国军部队 1/3 用于正面战场，1/3 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 在后方整训，敌后游击战也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 50 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当地杂系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数一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

当时八路军的教官介绍了游击战的另一条经验，就是官兵同甘共苦，并列举了八路军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的例子。对这一点，国民党军的军官们听后感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要求自己部队的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

中共方面的游击战思想历来公开宣传并

不保密，不过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的军队无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虽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游击战也无法有效开展。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弱点，就是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而增加老百姓负担，却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的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扫荡”下，许多部队只能处于东躲西藏的状态。

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最多。在鲁中的原东北军于学忠部同八路军关系较好，却一直未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于学忠本人在 1943 年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挥的吴化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又投降日军。1943 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总部无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复存在。

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也战斗了 5 年时间，结果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近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下极少数人撤回后方，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一统天下。

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靠“减租减息”

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因政治

素质差（众多将领见形势不利就投降便是例证），关键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处理不好，自然导致军心不振而经不起艰苦斗争考验。蒋介石的心腹、与毛人凤和郑介民并列为军统特务三巨头的唐纵在日记中对此也总结道：“士气低落的主要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当年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买办和豪绅等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在抗战中也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加重了民众负担，这也决定了无法解决军民、官兵之间的矛盾。

在日军一直进行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坚持下来还能发展壮大，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中所唱道的：“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

当年红军能奋斗十年并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贫苦农民拥护。1937 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占人口 80% 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未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全面抗战刚开始时，1937 年 8 月，中共

●史料钩沉●

中央提出“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便提出了“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正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这样便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加上实行“合理负担”，公粮主要由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来交，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阎王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人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

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实行“减租减息”后的各根据地，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日军“扫荡”的时期除外），群众自然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等武装就此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抗战时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而只好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而自愿参军。国民党当局曾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坐大”，其实仅“坐”如何能“大”，只有“越抗越大”，靠军民

持久奋斗才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

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要诀，日军也有入木三分的评价。据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回忆说，他的“御用挂”（日语，意为负责为皇室和皇帝办理事情的人）日军吉冈安直中将在1942年曾特地介绍了对付八路军的“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战法，溥仪当时不解地问：“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吉冈马上说：“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埋在红砂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

物质是第一性的，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最看重实际的中国老百姓通过得到物质利益，才衷心拥护共产党的军队。国共双方军队在敌后的不同结局，其根源就在于此。

·名句欣赏·

【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国益大】——《管子·霸言》

政：政绩。国从其政：国家的地位和它的政绩一样小。益：更加。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

烹：煎。鲜：鱼。

【治国譬若张瑟，大弦絙(gāng)，则小弦绝矣】——《淮南子·缪称训》

絙：紧，急。绝：断。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

正：指正常的方法。奇：指特殊的、变化的方法。



何家村遗宝

西安何家村遗宝之谜

1970年的秋天，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施工工地，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唐代窖藏，其内容的丰富和精美十分罕见。因此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何家村遗宝。时隔三十四年，何家村遗宝仍有无数未解之谜。有考古学家认为，这批遗宝是由唐代租庸使刘震在泾原兵变时埋藏的。但是，以刘震的身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这样贵重的财宝，那么，它们的主人如果不是刘震又会是谁呢？

首先从何家村遗宝的构成来进行分析，它出土了大量的钱币，共有466枚之多。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这枚被称为“即墨之法化”的刀币，“即墨”是春秋时的齐国都邑，“法化”就是法定的货币。单听名称就知道它来自春秋时的齐国。而其中年代最晚的是唐代的“开元通宝”，时间跨度达千余年。

不仅有西域的“高昌吉利”，还有前凉的“梁造新泉”，它们都是罕见的稀世珍宝。此外，还包括日本的“和同开宝”，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外国古币，空间跨度东至日

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些数量繁多，种类丰富，而且成系统，有目的拣选出来的钱币，它们的主人会不会是一位钱币收藏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卢兆荫：“因为它大量的东西有更加贵重的东西，像金银器还有少量的玉器，玉器里面的玉带，玉带胯，那不是一般民间的收藏钱币的人能够收藏得到的东西。”

民间难以收藏到的还有这些专门为宫廷赏赐、娱乐而制造的金开元和银开元。421枚银开元，是出土最多的一次。30枚金开元，则是目前考古史上惟一的发现。唐代诗人张祜的诗句“长说承天门上宴，百僚楼下拾金钱”，写的就是玄宗皇帝在皇宫的承天门楼上陈乐设宴，招待臣子时，向楼下抛撒金钱，百官争相捡拾的热闹喜庆场面。

从这些金开元、银开元的表面痕迹来看，它们从未使用过。这是否说明它们的拥有者不仅仅是喜好收藏钱币，而且还有权力、有条

●史料钩沉●

件铸造钱币？

何家村遗宝中还有成组成套的药具和大量药物出土，这些药物在唐代均为名贵药物，其中仅朱砂一项，就有 7 种规格。药具中有贮藏药物的罐、盒、鼎，煎药的锅、铛、铤等，还有几件被称作石榴罐的纯银器皿，它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育成：“在炼丹的当中，石榴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它是一种应该说是必需的一种用品。除此之外，那些像大粒光明砂，包括那些钟乳石等等这些我个人认为都是作为炼丹的药物来使用的。”

难道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一位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人吗？

遗宝中与道教关系密切的还有十二条金走龙。有专家认为，走龙是道士为信徒举行重大仪式时，用来向东南西北及天地六方之神表达诚意，祈求长生不老的信物，摆放时龙头就朝着它要指向的那方神灵。走龙有金、银、铜、铁等不同的质地，金龙的级别最高，只有地位最为尊贵的信徒才可能使用。

它是否暗示着这批遗宝的主人是一位精通道术的尊贵人物？而何家村遗宝出土的地方就是一处道观的遗址呢？

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上有大量的墨书题记，它们记录了包括存放物品的名称、重量、数量，物品的使用方法和来源，以及金银器自身的重量等，内容详尽，仔细认真。这件大粒光明砂银盒，它的盒盖里、外都有墨书题记，

分别记录了 7 种物品的数量和重量，另有一些带墨书的器皿，明显属于一组，入库时统一称重并墨书标出，经核对丝毫不差。

如果私人财物没有必要做如此详实的记录。墨书题记应该是在收藏入库时登记称重留下的笔迹。这些器物出土时，墨书题记都非常清晰，说明它们自入库登记后再没有被使用过。同时还说明对这些器物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

何家村遗宝中共出土了十副玉带胯，除了这副来自西域骨咄国之外，其余大多来自同为西域的于阗国。于阗自古以产美玉著称，于阗玉深得唐代皇室贵族所喜爱。除了于阗国主动前来贡献外，唐代朝廷还会亲派使节前去求取。唐太宗曾派内官朱如玉一次就从于阗带回玉器数百件，其中仅玉带胯就达三百具。带胯是装饰在腰带上的佩饰，这种佩饰可以有玉、犀、金、银、鎏石、铜、铁等多种材质，唐高宗时规定，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才能使用玉胯制作的腰带。因此玉带成为唐人服带的最高等级。

何家村遗宝的主人究竟是谁？他拥有许多高等级，只有宫廷手工作坊才能制作出的玉带胯；他尊崇道教，喜服丹药，拥有最尊贵的信徒才能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小金龙；他喜好收藏钱币，并且有权力和条件铸造钱币；他拥有的大批财宝上题有墨书，这是在登记入库时才可能留下的记录。种种迹象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皇室。如果它们属于皇室拥有，还有一个疑惑困扰着我们。

何家村遗宝中有一部分金银器皿，虽然制作精美，但从纹饰上看尚未完工，这件孔雀纹银方盒，正面对称的两只孔雀相比较，左边的腹部还未篆刻出羽毛，脚下踩着的莲蓬也没有孔眼；这几件鎏金小银盒，盖面上仅仅刻画出起稿线，而且起稿线细如发丝，离纹饰加工的最终完成还有许多道工序。这些银饼、银铤、银板，上面有明显的切削痕迹，似乎是作为原材料使用的。这是否表明，它们来自一处金银作坊？

专家们认为，当时地方或民间不可能有如此高水平、大规模的金银作坊出现。

何家村遗宝中为什么会出现未完成品，至今没有更明确的答案，但专家们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这些精美的金银器大多数应是由唐代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制造，供皇室使用的。

这件何家村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它的造型和莲瓣装饰采用锤揲工艺制造而成，然后用篆刻的手法在莲瓣内篆刻出各种动物与飞禽。凸凹起伏的莲瓣使器物宛如盛开的花朵。它是一件重达 391 克的纯金制品，黄金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贵重的金属，这样豪华精致的制作，不仅表达了唐代最优秀艺术家的审美情趣，也凝聚了顶级工匠的才华智慧。

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已经有了金制器皿，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金盃和金杯。是至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器皿。它们是采用范铸工艺制造的。范铸源于青铜铸造技术，青铜古老而成熟的工艺对金银器的加工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金银器制造使用范铸法的缺点是很难造出薄胎器物，胎体厚重浪费材料。但唐代早期金银器多为皇家贵戚使用，制造时追求宏大华美，不计成本，因此用范铸法制造的金银器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何家村出土的大多数金银器，在制作工艺上已呈现出许多让今人都十分惊奇的新创造。

唐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高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锤揲和篆刻技术的成熟应用。锤揲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软的特点，将金银片放在模具上反复锤打成型，然后进行篆刻。篆刻是通过大小不同、形式各异的篆刻子，用小锤击打，在器物表面形成各种花纹图案，达到装饰效果。用锤揲和篆刻技术制造的金银器皿器形轻巧，花纹精美细致。

在荀子的《劝学篇》里有一句名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就是指这种加工工艺，它采用透雕的办法把金属片镂空，使里边的香料通过镂空结构散发出来，造成香烟袅袅升起的效果，从设计到工艺，都达到最高水平。

除唐代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制造的这些金银器之外，何家村出土的器物中是否还有其他来源呢？遗宝中有一只底部刻有“进”字的银碗。在唐代，特别是唐后期，地方进奉财物渐成风气。每年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生日，地方官都争相进奉财物以示孝忠。而每有进奉，这些器物上往往要刻上一个“进”字。

考古学家在对何家村遗宝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这批遗宝中有些是由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而何家村出土的兽首玛瑙杯、素面

●史料钩沉●

罐形带把银杯等古代东、西方艺术珍品,是由外国使节和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带到长安,进献给朝廷的贡品。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唐代壁画《客使图》,有专家认为,这幅壁画上的客人分别来自日本、罗马和波斯。而何家村出土的外国钱币也恰好来自这三个国家,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唐代都城长安,作为国际性大都市,已经非常繁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长安城曾有过的辉煌盛况。

随着大批被称为“胡人”的西方客人云集长安,他们带来了多彩多姿的异域文化,各民族的文明在这里相互交融,不分彼此。

在唐代的皇室贵族中,“胡化之风”十分盛行,一切外来新鲜的事物,都成为他们喜好

的对象,何家村遗宝中大量外来器物 and 外来器物仿制品正是这种社会时尚的反映。

何家村遗宝中,有唐代中央官府手工作坊为皇室制作的金银器和玉器,有地方官吏进奉给皇室的贡品,有外国使节和商人进献给朝廷的宝物。这些不同来源的珍宝,不仅代表了唐代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丝绸之路”畅通时的燕婉热闹,见证了开放的唐代对外交往的频繁和强盛。

有考古学家推测,与何家村遗宝埋藏地点和埋藏年代相吻合的唐代租庸使刘震,是当时最有可能接触这批财宝的朝廷官员。在大规模战乱发生时,是他将这些皇室拥有的财宝埋藏起来。也正是他的这次埋藏,为我们留下了这批遗宝,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无法解开的谜团。

·解字·

创



这是“创巨痛深”的“创”字,本为象形字。①是金文的形体,马叙伦认为“象伤物所著之血”。这是指“刀”割过后,刀上还沾了两滴血。②是小篆的写法,基本上同于金文。③是楷书繁体字,是由原来的象形字变为左声右形的形声字了。④为简化字。

《说文》:“创,伤也。”其实,“创”的本义应为“割”,而“伤”只能算是引申义,如《后汉书·华佗传》:“四五日创愈。”,这是说:四五

天伤口就好了。“创”有“突破”义,所以凡事有所突破也可以称为“创”,比如“创举”、“开创”等。不过这些词中的“创”字必须读为 **chuàng**, 而不应读作 **chuāng**。

请注意:王充《论衡·书虚》中有“吾君背有疽创”句,这里的“疽(jū)”是一种毒疮,所以“疽创”也就是“疽疮”。可见,“创”字是“疮”字的假借字,在“疮疖”、“生疮”等意义上,可代“疮”而用。



西安城门趣闻(十四)——尚俭门

(西安城北面偏东门之一,位于尚俭路北出口)

1. 尚俭门位在唐丹凤门街

今尚俭门位于昔唐长安外郭城东北隅丹凤门街北段之处。高宗龙朔(661-663)时期,将大明宫前的翊善坊与次南永昌坊,各中分为两坊,中开丹凤门南北大街。此街南北尽二坊之长,约1200余米,街宽一百二十步,约合176.4米。这条垂直于大明宫前的纵街,是长安城中最为宽阔的一条大街,实际上是大明宫丹凤门前的一条大的宫廷广场,今尚俭门北对丹凤门,位于丹凤门大街的北段。

2. 尚俭门外唐保寿寺

今尚俭门外,唐时有一座保寿寺。该寺位于唐长安城东北隅大明宫前翊善坊,本为大宦官高力士宅,天宝九载(750年)舍宅为寺。寺院规模宏大,以翊善坊连接南面的来庭坊,占南北两坊之地。寺中塑有先天菩萨像,共二百四十二首,其藏经阁规构危巧。传说当时保寿寺初铸钟成,高力士设斋庆贺,文武百官,举朝毕至。凡撞钟一下,即要施钱百千。有规劝高力士其意者,连击至二十杵。



华严寺—— 佛教华严宗的发源地

2011年连续降雨，造成
华严寺两侧塬体数次滑坡

华严寺位于西安市南长安县杜曲镇城东南少陵原畔上，距西安城约15公里。为唐代著名的樊川八大寺之一。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发源地。居高临下，是登高远眺的好地方。站在华严塔前，可俯视樊川，远望终南山云雾。是一处旅游胜地。

据《长安志》《咸宁县志》载：“寺院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亦说建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僧人杜顺在此创立华严宗，其三传弟子深得武则天宠信，被称为“华严宗大师”。四传弟子澄观被尊奉为教授和尚，授“镇国大师”、“僧祖清凉国师”称号，并主持当时全国佛教法事。因此，华严寺是唐代地位相当高的一所名寺。

清乾隆时，少陵原一部分崩塌，寺内殿宇全被摧毁，仅存两座砖塔。东为华严宗初祖杜顺和尚的灵骨塔，呈方形角锥体，7层，高约13米，平面呈方形，为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每层叠涩出檐，檐下均砌两层菱角牙子，塔身壁面用砖砌成扁柱、栏额、斗拱、昂等，每层均作辅间，每三层嵌有“无垢净光宝塔”刻石，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侧为华严宗四祖清凉国师的灵骨塔。清凉国师名澄观，俗姓夏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享年102岁。清

凉国师塔平面呈六角形，为七级六面砖塔，高约7米，塔上嵌有“大唐清凉国师妙觉之塔”刻石。因塔临少陵原畔，雨水冲刷，有倒塌之势。县文物部门于1986年拆迁时在4、3、2各层塔心发现有鎏金铜佛像、千佛碑和佛经等。在塔基下又发现作风迥异，雕刻精美的两层砖塔，高约6米。据记载，元至元九年（1272）曾重建清凉国师塔。但从出土的铜佛像与佛经看，都是清初遗物。由此说明，现在地上5级砖塔，应是在清乾隆年间少陵原崩塌时所毁元代妙觉塔基础上重建的。拆迁中发现的地下两层风格不同的塔，当是元代重修的残塔，在残塔下还发现塔心内室藏有石函1个，内装有高11厘米的白玉瓶1个，瓶内装舍利，铜佛像1尊，高13厘米，均系唐代遗物。在清凉国师塔侧，有清雍正年间加封澄观为“妙正真乘禅师”时立的碑石1座。该塔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前还有清末《重修华严四禅清凉国师塔记》碑。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刻的《杜顺禅师碑记》碑，已移至西安碑林保存。

华严寺2005年曾进行修复。2011年西安遭强降雨，华严寺多处大面积滑坡，部分建筑严重受损。从2012年4月开始，再次进行了大的修复。



高桂滋公馆

流年：高桂滋公馆记忆

◎ 张艳茜

西安市建国路 83 号的“高桂滋公馆”，曾经是一座由前院西式主楼与后面三座相对独立的四合院组成的建筑群，主楼与三个四合院间相通相连，每个小院有各种名贵树种——紫荆、海棠、丁香、腊梅、白玉兰、合欢树等等，悠然自在地生长在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中。

“高桂滋公馆”的主人为曾率部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国民党军抗日将领高桂滋。1933 年，在参加了长城抗战之后，高桂滋在西安选中了建国路启新巷（今建国二巷）一带，要为自己建一所比较合意的房子，以供日后长久居住。恰巧“高桂滋公馆”与南面的“张学良公馆”成为邻居。

“高桂滋公馆”尚未完全竣工时，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这起改变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也使“高桂

滋公馆”成为万人瞩目之地。“西安事变”发生两天后，“高桂滋公馆”住进了第一个主人——蒋介石，蒋是由新城大楼被转送到“高桂滋公馆”住下的。当时出于安全考虑当然是最主要因素——“高桂滋公馆”与“张学良公馆”相邻，而这里暖气设备的先进程度，当属西安最好的。时值冬季，在高桂滋公馆的主楼东耳房住了十一天的蒋介石，心理上的痛苦煎熬是肯定的，但是身体上并没有因此受冻而感觉不适。

如今，“高桂滋公馆”主楼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块字迹已显斑驳的木牌，写有公馆的简介：

高桂滋公馆位于建国路，始建于一九三三年，为国民党军八十四军军长高桂滋将军公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西安事变中被扣的蒋介石由新城大楼转迁至此，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抵陕后在此，

●西安风情●

向蒋介石报告了南京政府的情况和蒋商议，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的意见。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在这里与蒋会晤，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六项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高桂滋公馆，是西安事变重要的旧址之一，一九八二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在“高桂滋公馆”主楼阶梯旁边，立了一块刻有“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石，字迹同样斑驳不堪。

“西安事变”六十年后的 1995 年夏，蒋介石住过的“高桂滋公馆”东耳房，成为一个有着极高声誉作家的办公室，这个人就是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而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陈忠实。陈忠实曾撰写一篇散文《办公室的故事》，讲述了发生在高公馆、发生在公馆东耳房的故事：

蒋介石虽然在高公馆住了只有 11 天，却发生过许多历史性的情节和细节。他刚被转移到这个东耳房，张学良便从他的公馆赶过来看望，一副毕恭毕敬的军人礼仪。张学良连叫几声“委员长”，蒋介石不仅不搭话茬儿，裹着被子蒙着脑袋连脸也不露给他看。此前，送过来的饭食也不进口，一副绝食的抗议。

高桂滋本人在高公馆居住的时间极为短暂，1950 年高桂滋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北农林部副部长后，住回了高公馆。1951 年他将高公馆作价 15 亿元(旧币，约相当于人民币 15 万元)捐献给国家，并用此款购买了

一架战斗机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此后，“高桂滋公馆”先后成为西北妇联、中苏友好协会等机关团体的办公地点。1954 年，这里成为刚成立的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地点，1956 年 4 月 1 日省作协的文学月刊《延河》创刊，编辑部也在“高桂滋公馆”内办公。

“高桂滋公馆”这个院落，在 1956 年到 1966 年，门牌号是建国路 7 号，那时在院子里办公的陕西省作家协会，还被称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省作协被赶出“高桂滋公馆”，先迁往西安市红缨路，后又到东木头市 172 号。而这里的门牌号则改为建国路 73 号，高公馆进入了一段长达八年，极为黑暗的历史时期。其时，高公馆的主楼底层成了关押中共西北局“走资派”的地方，刘澜涛、舒同、刘文蔚，包括当过副总理的习仲勋等都曾在此关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陕西省委于 1979 年 6 月 9 日，向省内各地县下发过一个以门牌号命名的《关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详细讲述了发生在“高桂滋公馆”内鲜为人知的丑恶与残暴：

“七十三号”即原西安市建国路七十三号，从一九六七年三月到一九七五年四月，这里办了一个“监护管理所”，由省革委会政法组负责管理，省项目办公室负责政治审查。先后关进去五十五人，其中西北局部长以上、省委书记、省人委副省长以上干部二十八人。

“七十三号”实际上是个监狱，是用法西

斯的一套办法管理的,凡是进去的,都当敌我矛盾,完全限制自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每个人都单独关押,互相不许见面。见了面也不准说话。早晚两次“放风”。每个人都编了号,叫号不叫姓名。外调、谈话叫“提审”,有专门的提审室和审讯室。夜间睡觉通宵开灯照明,以便监视。不准家属探望,不准通信自由,伙食标准低,管理差,普遍吃不饱肚子,饿肚子,有人浮肿。还随便搜身,任意打、骂、体罚。

1976年笼罩在“高桂滋公馆”阴霾逐渐散去,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了。高公馆与陕西作家们一起,共同迎来了政治的春天和文学的大丰收季节。

1975年底至1979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各部门陆续从西安东木头市172号,重新回到建国路“高桂滋公馆”。许是为洗刷掉“73号”的血泪与污秽,此时的门牌号已改为建国路71号。省作协的机关刊物也从1977年7月,刊名由《陕西文艺》重新恢复为《延河》。老式的大院门口,一边是挂着“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的木牌,另一边水泥门框上刻着“延河文学月刊社”的刊名。

那些常在报刊书籍上见到的大名,如胡采、王汶石、李若冰、杜鹏程、路遥、陈忠实、王愚等著名作家以活生生的形象,行走在“高桂滋公馆”的大院里。这些作家们看似很平常,他们有着普通人一样的笑容,高兴时开怀大笑;他们也有普通人一样的情绪,激动时亦慷慨激昂;他们穿着朴素,走在街上,不点破身

份,很难将他们和著名作家联系在一起。在高公馆日渐破旧的房子里,他们聚在一起谈文学、谈时事、谈足球、谈家常,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简陋的写字间,坐在嘎嘎作响的旧式藤椅上,伏向漆面斑驳的写字台。那时,跃然纸上的文字,就使他们大不一般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睿智,他们创造的形象,随同着他们的文字跳跃着,高大着,丰满着。一个一个丰硕的创作成果,也随着这些文字变为铅字,不断地为广大读者制造着文学的盛宴。于是,今天这个作家的短篇小说获奖了,明天那个作家的长篇小说出版获得好评了。这些讯息,接二连三地高公馆的院子里传播着。

1998年之后,陕西省作家协会为改善办公条件,除“高桂滋公馆”前院的主楼和喷水池保留下来,后面的三个四合院被拆除了,要在原地盖起办公用的高楼。那些名贵的树种被砍伐掉了,办公高楼却因一时资金不到位,整个院子荒芜了好长时间,四处杂草丛生。

2000年之后,“高桂滋公馆”——也就是陕西省作家协会的门牌号又改为建国路83号,一直沿用到今天。

2002年,省作协的办公大楼矗立在了过去三个老式的四合院之上。曾经带给大家含蓄、内敛、欢快、健康又温情脉脉的记忆,以及新的文学春天里温馨舒畅的日子,仿佛随着三个老式四合院的消失而一同消失了。亘古不变的月光如水一般从“高桂滋公馆”前院那座充溢沧桑感的主楼流淌下来。俨然只有它还在孤独执著地守望着,凝视着过往的难忘岁月。

风雨人祖庙

◎ 鹿志锋

一

羊年春三月一天下午,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我和两位年轻的学生朋友相约,驱车前往百花岭一带欣赏春天的美丽景色。

听说有人祖庙,时空悠久,传说神奇,世界之初,是我中华民族初祖诞生的圣殿,造人的神地,就在临潼骊山的山顶,于是我们一时兴趣所至,一路沿弯弯山道盘旋而上,谈性也油然而生,自然离不开自然、社会、人生,时间、生涯、命运、自由,一番番感慨,随花开放。

两面山岭逶迤,草木繁荣,百花盛开,空气清新,时有山雀飞翔鸣叫,景致不俗,如诗如画,心旷神怡。

二

登上骊山人祖庙处,在朗朗日光下与飒飒凉风中,驰目四望,但见山峦逶迤,首尾相连,悬崖如刃,古柏高耸,气象森然。

进了人祖庙寺院,但见庙宇破旧,面积不大,土墙灰瓦,年久失修,比起那些占地阔大、翻修一新、华丽轩昂的殿宇,就显出一片破败苍凉的景象来,令人心中不免失望,哦,人祖

庙原来如此啊……

然而再看,寺外群山环抱,云雾缭绕,古柏参天,寺内木架祥物,殿宇神像,绿草黄花,在瞬间阴云蔽日天色昏暗的背景下,则为之增添了一种原始、悠远、清静、古朴、神秘、脱俗的人文韵味。

于是读人祖庙介绍,方详知人祖庙位于临潼以东骊山最高峰,周围群山环抱,山岭逶迤,古柏参天,景色迷人,人们把蜿蜒的八沟九岭称为九龙,人祖庙就坐落在这九龙的相会之处,龙头之上。

再到寺外观看,果见在天地之间,骊山九峰相连,悬崖峭壁,古柏苍翠,形象险峻,形似九条苍龙盘旋而居,仰首而观天象。

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智慧的民族,古往今来就具有丰富的想象,因而民间传说,为人祖庙的产生涂上了一层神秘的人文色彩。

相传上古之时,先民们遭遇洪水灭顶之灾,世间只剩下伏羲与女娲兄妹二人,为了承传人间烟火繁衍后代,他们指着石磨向苍天默默祷告,如果二扇石磨从山坡上滚下而又自动相合,便即成婚,否则作罢。

祷告之后,兄妹俩人遂各执石磨一扇,同时从骊山顶上滚下,结果两扇石磨恰巧合在一起,似被一只无形巨手稳稳托起,于是兄妹二人将其视为“天作之合”,依照天意结婚生子,繁衍了中华民族。

人们为了纪念,遂建造了一座规模恢宏的古刹,供奉着伏羲和女娲的神像,同时以人祖庙为中心点,向四周辐射,形成了“伏羲创设八卦”“女娲补天”“女娲抟土造人”等一系列传说故事与奇观异景。

老母殿”“老君殿”“老嫫沟”“母诞沟”这些奇观异景,也借助自然形象山水、斑斓花木、森然气象,形成叹为观止的景观群,仿佛自然与神明的鬼斧神工的妙笔,让人祖山上的人祖庙更为神圣。

然而,象征中华民族诞生的人祖庙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圣殿坍塌……正说间,阴云排空,风雷大作,冰雹骤下,仿佛是人祖显灵。

四

带着一种具有神秘想象色彩的心理,我们慌忙躲进人祖庙的大殿里,也是躲风躲雷躲雨,也是朝见人宗人祖人神,还颇有感获。

人祖庙大殿中间,供奉着伏羲与女娲的彩色神像,两边供奉着轩辕黄帝与神农炎帝的彩色神像,左右两侧站立着金色的十二生肖肖像,尽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绝不是无根论者,无论是神话传说还真有其人,对中华始祖伏羲、女娲、黄帝、炎帝始终心存敬意。

大殿右侧放着香蜡的桌后的竹椅上,坐

着一位头戴道士帽、留着胡须、面容清癯的长者,我们猜想一定是人祖庙主持,就恭恭敬敬上前询问关于人祖庙的源脉,老者虽然看起来不苟言笑但是却颇为开朗健谈,就详细告诉了我们,他为什么在人祖山守护人祖庙的来龙去脉。

老者是临潼县人,二十岁的时候偶尔看了道教书籍,感上了兴趣,就一个人离家出走到太白山寻访寺庙,随寻找的家人回来后,听到了关于人祖庙的传说,就寻找到人祖山修建人祖庙的地方,但见是一片瓦砾、土堆、朽木,这正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毁坏后的人祖庙遗迹。

老者告诉我们,从此他就产生了重修人祖庙的心愿,于是先在庙址上盖上草庵住下来,开始募捐筹钱,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修建了庙宇,塑铸了伏羲与女娲、黄帝与炎帝的神像以及十二生肖的肖像,修建了土围墙,盖起了门楼,并且整理了关于伏羲与女娲的传说故事资料。

我们问老者,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在这里修建庙宇,塑铸神像,接待香客,老者略一沉吟,回答说自己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也有心愿来守护中华民族的人祖,在这人祖山上,虽然住的是土房瓦屋,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布衣道袍,但是他觉得这样就满足了的自己愿望。

听了老者朴素的言语,我在心中对老者油然而产生了一种敬意,啊!人生精神丰富多彩,价值取向不同,而在这远离世俗的人祖山上,这位老者甘于清寂,接续香火,其实担当了一位中华人祖的守护者!

也许是山高林深,也许是人祖显灵,人祖

●西安风情●

山上气象变化神秘，风雨冰雹过后，阳光普照，一弯彩虹悬空，景象奇异，恰似天人感应。

五

中华民族神话传说丰富，人文历史悠久，有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类、伏羲演八卦、三皇与五帝的华夏源脉之说，纷纭而多彩。

据史书记载，夏有《归藏》，商有《连山》，周有《周易》，到了春秋时期经孔子整理改名《易经》，本书以中华为圆心点，上观日月，中观万物，下观河岳，经天纬地，而立太极，而分阴阳，而演八卦，而开六十四卦，灵算自然、社会、人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智慧之书。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产生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诸子百家，思想争鸣，文化繁荣，价值多元，形成与古希腊遥相呼应的“轴心文明”时代，然而自从秦汉以后，儒法合流形成奴隶主义与专制主义，成为皇权统治的主流文化，还竟然以皇权意志修改人祖庙的名称。

据乾隆朝《临潼县志》卷八云：“骊山东岭离邑二十余里有人祖庙”然而在秦代，人祖庙被改做“始皇祠”；在汉代，此庙又被称作“汉露台”，在唐代，人祖庙被称作“大地婆父祠”；所幸到了明清年间又恢复为“人祖庙”，人祖伏羲与女娲的灵魂终于又回到了人祖庙。

正是因为秦汉以后，儒法合流，形成两千多年的君主皇权政治专制主义，压抑思想自由，精神创新，文化多元，不仅造成近代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遭受欺凌、丧权辱国的民族悲剧，而且形成中国人的虚幻精神、奴性精神、流氓精神，从智慧的民族变成了愚昧的

民族。

在 21 世纪的今天，思想觉醒的中国人，都意识到中华民族精神需要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于是出现了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返回华夏精神血脉的智慧源头，或寻找尧舜道义，或寻找孔孟道德，或寻找老庄哲学，或寻找炎黄精神，或寻找伏羲智慧，人们朝见人祖庙亦属此举。

我以为，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朝见始祖先贤圣人，能让同胞获得原始根脉文化认同，但要重建民族精神智慧，应在继承优良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以五四新思想文化精神价值为主轴，吸纳世界先进文化，从而建立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

哦，开天地的盘古、造人类的女娲、演八卦的伏羲以及三皇、五帝、先贤、圣人，你们如若天上灵有知，也许会认同我的想法的。

六

天色渐渐向晚，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守护人祖庙的老者，似乎谈性尚浓，领我们在大殿的左侧观看一尊形神奇异的石像。

老者说，石像天然造就，浑身开着天眼，上观天象，中观万物，下观地貌，这让我联想起老子的上观天道、中通世道、下察人道的“道法自然”的哲学与庄子精神逍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心灵自由”的哲学，我想，其实老庄哲学也许与人祖伏羲与女娲的心灵是相通的。

出了寺院，但见落日西沉晚霞朦胧，人祖庙以及四周的山岭、林木、殿宇笼上了神圣的色彩，我们也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意离开了。



三位主编向大家介绍书籍内容

北张村——三位老人历时十年写村史

一本名为《北张村纪事》的史志类新书，9月16日在西安市长安区兴隆街办北张村的传承古会这一天，举行首发仪式。该书由本村三位年届八旬的离退休老人历时十年编撰而成，数位本村企业家出资刊印，以此期望后人铭记过去，继往开来，留住精神家园。

该书作者邹圣周是位离休干部，今年已经87岁，曾任长安县法院副院长；81岁的张鸿济在县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工作了大半辈子；最年轻的蓝信鼎也已72岁，是位退休教师。三人解放初相继出村外出工作，一心为公，自认为没给村里办过什么事情。离退休后，想为村里乡亲做点贡献，随萌发将村里的好人好事、建设发展、历史变迁记录下来，以此昭示后人。也希望用北张村的民间小事、百姓生活，从细微处反映农村变迁的时

代风貌。

从2005年6月起，三人在村里发出了一封《致北张村父老乡亲的一封信》，希望村民共同参与，搜集村史材料和实物。他们表示：着笔记述纯历史，重在资料和史实的准确与真实，力争不虚假、不夸张，存真求实。文字通俗、朴实活泼，让男女老少都看得懂。

地处泮河之滨的北张村有千年历史，是西安市长安区有名的历史古镇，民风淳朴，人杰地灵，特别是手工造纸名闻海内外，素有“纸乡”之称。该村从解放到如今，在党和政府领导之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由一个传统农业大村，发展为集农、工、商、贸为一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位老人协同其他采编人员，历时十年外出查找档案，走访群众两千余人，九易其稿，终于在今年四月将这本25万字的村史定稿。该书采用编年章节，集历史沿革、农业生产、手工造纸、教育卫生、文化艺术、民情风俗等十方面内容，文中图片、牌匾、碑文都来自村民和档案馆的收藏，多为首次亮相。

获悉三位老同志编撰村史的事情后，该村张占胜、兰喜吉、张户生等十多位企业家纷纷捐款，集资十余万

●我们的村落●

元将书稿刊印出版。在首发仪式上,两千余本散发墨香的新书免费发放到每户,村民们竞相翻阅,寻找家乡的过去。他们说,村民写村史,这事情自古到今在我们村及周边还是头一次。

在发行会现场,长安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韩文军、区政协副主席张军省、区地方志主编,原长安区政协副主席王百忍等领导向主编邹圣周、张鸿济、蓝信鼎颁发了“情系故里,

惠泽桑梓”牌匾,向踊跃筹资出版《北张村纪事》的企业家张占胜、兰喜吉、张户生等同志和多名付出辛勤劳动的编务人员颁发了特别贡献奖杯。

赠发仪式后,“我爱家乡北张村”首届书画展在村城隍庙开展,北张村籍 12 名书画家和省市 13 名著名书画家在村中正街现场挥毫泼墨,向村民赠送作品 340 余幅,令广大村民欣喜不已。

周宋村——感恩桑梓写村志

◎ 景浩学

《周宋村志》在西安市和雁塔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周宋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重视下,在村上乡亲们的配合支持下,经过 5 年的编写和反复修改,终于在今年出版。这是我这位退休的新闻工作者为报恩于桑梓,而完成的一件事,深感欣慰。

我生于周宋村,成长于周宋村,村上的父老乡亲的勤劳、朴实、厚道,在我离村在外工作几十年中,每当回到村上探亲,常常感受到乡亲们的厚爱,不时听到村上智慧老人讲起村上的往事,给我留下深深的回忆。15 年前,又一次我回到村上,听说村上周姓先祖的《墓志铭》在西安东郊韩森寨被发现,引起这个以周姓为主的周宋村村民们的重视,我便随同

村干部和一些周姓村民,前往韩森寨一周姓人家目睹《明怀远将军西渠周先生墓志铭》。因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养成了职业习惯,当从《墓志铭》中得知周宋村周姓先祖祖籍江苏省扬州市,我便利用假期亲往扬州市和江都区,查阅周宋村周姓先祖的有关历史资料,并在扬州、江都乡间走访周姓人家。我根据《墓志铭》和周宋村人文历史资料,撰写出约 2000 字的《周家寨村史铭》。周宋村两委会请富平县石雕工艺厂将《周家寨村史铭》刻立于村口,成为村民了解村史的宝贵资料,成为激励和教育下一代的村史教材。

我从事新闻工作近 30 年,在我退休前后,曾参与编写地方史志和中国石油开发志



编写工作,接受地方史志专家的培训,研读史志专著。2011年,我放弃了优越的城市生活,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周宋村安度晚年。此时,正值西安市政府发文,要求各区、县、乡镇、街办组织编写村史村志,周宋村党支部、村委会决定组织编写《周宋村志》,聘我为总编辑,从事村志的编写。根据地方志的规范、结构和村志的特点,我初拟了《周宋村志》的编写提纲,在周宋村两委会上进行了汇报,征求意见。经过两委会集体讨论,将编写提纲确定下来,并对村志的凡例进行了界定和规范,使收集资料 and 进行村志编写有了纲目和规范。

收集和整理资料是编写村志的前提。村志必须真实可信。因此,必须把功夫下在收集资料上。我根据周宋村先祖《墓志铭》,首先挖

掘历史资料。我多次在陕西省档案馆、西安市档案馆、雁塔区档案馆、长安区档案馆和陕西省图书馆查阅与村志有关的明史、清史、民国史志资料,并多次前往与周宋村周姓为同一先祖后裔的周家河湾、黄堆村、韩森寨走访。前往周姓先祖明怀远将军曾镇守过的商洛、丹凤、武关,从当地档案馆查阅资料,并在民间走访。当从陕西省地方志馆和陕西省图书馆细阅明代陕西通志中,获知周宋村周姓先祖在明代七位世袭军职中,陕西镇守总兵周玺,在明弘治初年,曾任明大同副总兵,其父周玘曾建旗辕门于河北迁安,我便与当地地方志办公室联系,河北省迁西县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潘秀华寄来民国时期迁安县志中周玺传记,从而考证和丰富了周宋村村志中有关古代历史资料。我根据《墓志铭》和多年收集考证资料,撰写了《明怀远将军西渠周先生墓志铭》考证文章,经过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碑林博物馆历史专家学者的审评,刊登在《西安地方志》2014年第六期。当我从鱼化地区资深老教师姚志锐处获知,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周宋大队地下挖土时,发现西汉铁铤等,我前往西安博物院求证,并在村民中走访,阅读著名历史考古学家武伯伦著作《西安历史述略》,从中获知周宋村早在西汉初年,地处上林苑,为司农之乡,是西汉制造铁制农具的作坊和仓库,从而将周宋村史推进了两千多年,提升和丰富了村志的内容和历史价值。

村志的资料仅从档案文字资料中查阅,

●我们的村落●

是十分有限的,大量的资料都是口碑资料,要靠深入走访调研中获得。要将周宋村五百多年的村史完整真实地记述下来,必将深入地进行社会调研。采访当事人是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之谈。我将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应用到收集村志资料中。我先后用3年时间走访了全村400多户家庭,走访了村籍在外人员及家庭成员。对尚健在的村籍人,我采取面对面直接走访。对已故村籍重要成员,我走访他们的子孙后代和亲属。对初步掌握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情况,为了核实准确,我不轻信一人之言,走访其多位亲属或知情人,达到多人共识共认,方可确信。为全面深入地掌握周宋村人文历史资料,我在收集村志资料的3年中,不仅深入到全村每家每户中走访,而且多次前往长安、周至、户县走访村籍人物的亲属。不仅了解村籍人物的生平,而且挖掘人物中有价值的故事情节,使村志写作资料既真实、又生动。

依据《周宋村志》的凡例和村志编写的规范,我采用篇章体与条目体相结合,将收集的村志资料进行归类整理,按照贯通古今、详今略古、横排竖写,全志分为3篇46章。经过2年编写,初稿70万字,先后修改7遍。周宋村两委会先后4次听取汇报和集中修改,并进行初评。送交雁塔区地方志办公室评审中,详细听取了评委们的意见,又修改2遍,全志文字压缩到60万字。

人物是志中之志,是志书中的精髓和重点。为将村籍人物写的真实而生动,我不仅在

收集人物资料中下了工夫,而且在写作人物章节中,尽心尽力做到人物既真实又生动可读。我是带着责任心和对故乡亲人们的深厚感情编写村志中的每一个人物的。明朝陕西镇守总兵周玺是古代人物,当我读到明《陕西通志》和民国《迁安县志》中周玺传记时,被周玺那种爱国精神所感动。当我写到革命先驱周聪良为革命事业,离村离家时领着5岁女儿到父母坟前告别的情景,我不禁为之落泪。当我写抗日英雄周明满为奔赴抗日前线杀敌,别离结婚半年的爱妻,亲自到户县定舟村,向爱国将领赵寿山将军请缨,后在山西中条山“六·六”会战中壮烈牺牲,我被这位抗日英雄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周宋村志》中人物传记有218人,许多人物我从没有见过,当听到他们的事迹,当写到他们那些动人的事迹时,我多次因感动而落泪。我在编写《周宋村志》中,被周宋村先辈们曾为民族、国家、社会和家族发展奋斗不息的精神所感动,被周宋村一代又一代承前继后的事迹所感动。我给周宋村两委会干部和村上的乡党们多次讲道:“不是我能写,而是周宋村志值得写,周宋村的人文历史和先辈们的事迹值得写,如果不写,有愧于周宋村的先辈们,也有愧于后辈们”。

经过西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审批,《周宋村志》出版发行,我为此付出了5年精力,了却了我多年想为家乡做一点事情的心愿,圆了我为生我养我的家乡父老乡亲们有所作为的梦想。



易有功是目前高陵手工花灯界的重要传承者之一

高陵民间花灯纸扎技艺

◎ 富小云 整理

高陵区花灯纸扎手工艺已有 150 余年的历史。主要传承人为易有功。易有功的师傅名叫董西武，早年在高陵城隍庙内居住，随庙内 60 余岁花灯纸扎师傅学习扎制工艺 13 年。擅长麒麟灯、莲花灯、石榴灯及丧事纸扎用品的制作。并掌握了纸张处理的配方，这一配方能使一般白纸变厚、变硬。经这种配方处理过的花灯外观饱满、平整，风吹雨淋不易损坏，在高陵花灯界被誉为绝。

易有功 19 岁起便跟随县城隍庙花灯纸扎老艺人董西武学习手艺，深得师傅真传。其花灯纸扎制作的工艺流程依次为选材备料、扎骨架、糊纸、秘制配方处理纸面、配色、搭配装饰等 6 道工序：①选材备料。选扎骨架用的竹簧、竹皮、竹竿，竹竿要求亮洁无霉变；选麻

纸，用于连接骨架的各个接头，要求韧性好，拉力强；准备白纸，以普通 35 克白纸最好；根据所扎对象准备油光纸、皱纹纸和普通纸；准备油漆，大多用红、黄、绿三种。②扎骨架。根据所要扎制花灯的造型下料，大的花灯分两次完成。小的花灯一次完成。③糊纸。先糊难度大的，后糊难度小的。④纸张处理。这是关键一环，要在整个花灯糊完后进行。将密制配方用毛笔涂湿整个灯面，之后进行晾晒。⑤上色。上色分单色和复色两种，民间流行的石榴灯、莲花灯一般为单色，现实的、写实的一般为复色，有颜色过渡。如动物灯、造型灯。⑥搭配装饰。将做好的花瓣、剪纸图案等按所扎灯的造型进行装饰，花灯纸扎整个过程完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易有功花灯纸扎融合了剪纸、绘画等艺术,是集扎制、造型、裱糊等手工艺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其扎制的花灯色泽艳丽,比例协调,寓意深刻。易有功先后制作花灯达 20 余种、万余件,最大的有六、七米之高,小的可在掌上把玩。他制作的花灯深得百姓喜爱,西安、渭南、咸阳、北京等地群众慕名前来购买,其“麒麟送子灯”还被收藏爱好者收藏,《陕西日报》《陕西农民报》《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西安电视台、陕西广播电台等媒体曾先后进行报道。易有功曾应邀为西安兴庆宫公园、阎良飞机城、县文化馆、县工人俱乐部等单位制作花灯。

易有功扎制的花灯分为三类:一是逢年过节喜庆类。如:石榴灯,一般做成两个石榴连体,灯嘴有 8 个瓣,代表四面八方。有 12 个叶子,代表一年 12 个月。民俗上讲究过年娘家给新婚女儿送石榴灯,表示希望女儿早生儿子,多子多福;麒麟送子灯,做成龙头、狮子尾、龙爪、牛腿、鱼鳞。过年时娘家人为新婚第

一年的女儿送一对这样的灯,表示希望女儿家祥瑞美满,上天送来仁义的麒麟儿;莲花灯,分白莲和红莲两种,两种灯做法相同,灯下部为莲藕,莲头部分是实的,莲尾部分做成不完全状,寓意后继有人的莲藕共三节,莲头、莲身、莲尾,表示有头有尾。节节之间有须根和芽子,表示莲里生子,灯中间为四层莲花瓣,花灯上部表面有绿盖子,意为莲蓬,莲蓬上有 12 颗象征莲子的银点,寓意为 12 个月,年年品行高洁,生生不息。红莲花灯一般是舅家给外甥女送。白莲灯一般是娘家给结婚三年以上而没孩子的女儿在过年时正月十五前送,送时娘家人把花灯交给婆家村里儿孙旺的人,让其正月十五晚给女儿家挂上,不许和别人说话,农村讲究这是希望送子娘娘给送来孩子。二是赏玩类。鼠、牛、羊、虎、马、兔、龙、蛇、猪、狗等十二生肖,大的可做成五、六米高,小的花灯可放在手里把玩。三是装饰类。蝙蝠、蜻蜓、蜗牛、熊猫、大雁等;还有汽车、飞机、福娃等。

(上接第 35 页)次展示了他才思敏捷的一面。

和珅新修了一所府第,特意请纪晓岚题匾。因一同入朝为官,纪晓岚不便推辞,便题了“竹苞”二字。和珅以为是“竹苞松茂”之意,满心高兴。不料,乾隆皇帝看了后却笑他:“怎么,你家里的人个个都当草包了?”和珅不解,辩解道:“皇上有所不知,这是‘竹苞’呵!”乾隆笑得更厉害了:“看来只有朕深知晓岚之心

也。想想看,‘竹苞’二字拆开来,不就是‘个个草包’吗?”和珅听了,如梦初醒,方知纪晓岚题匾的真实含意,其实是骂自己家里的人个个是草包。虽然气急败坏,也只得自认倒霉,只怪自己悟性差,赶不上纪晓岚的那份聪明。纪晓岚就是这样,用智慧和才华巧妙地嘲弄了一次和珅,并且让和珅有苦说不出,只能心生暗气。



纪晓岚 妙语解尴尬

清朝名臣纪晓岚以机智善辩著称。少年时代纪晓岚就聪颖过人，一次和小伙伴们在街上玩球，恰好知府乘轿经过，一不小心球被掷进轿内，孩子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纪晓岚见状便壮起胆子上前讨球。知府知他天资聪慧，便戏弄地出了个上联：“童子六七人，惟汝狡。”让纪晓岚对下联，说如对得工整，就把球还给他。纪晓岚稍加思索，便答道：“太守二千担，独公……”，“怎么不说完？”知府急问。“你要是还我球，就是独公廉，不然就是独公贫。”知府闻言一愣，只得把球还给纪晓岚。

成年后，才子纪晓岚深得乾隆皇帝赏识。一次乾隆皇帝微服私访，纪晓岚伴驾而行，走得口干舌燥之际，正好看见路边有一棵梨树，口渴难耐的纪晓岚便走上前去，摘下一个梨便大口地吃起来。乾隆一见，生气地说：“孔融四岁能让梨，爱卿得梨为何不让，却自己先吃了？”纪晓岚自知失礼，看着手中啃了一半的梨，机智地解释说：“梨者离也，臣奉命伴驾，不敢让梨。”乾隆听了，心想这种解释也有道理，可是心有不甘，便说：“那咱俩分吃了也好

啊？”纪晓岚立刻说：“皇上，您想想，臣怎敢与君分梨（离）呢？”乾隆听了，点头一笑说：“言之有理，那你就自己吃吧。”

又有一次，乾隆皇帝想试验纪晓岚到底有多善于应对，就对纪说：“你知道什么是忠孝之道吗？”纪答：“知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称为忠；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叫做孝。”乾隆说：“你说得好，朕就赐你一死，如何？”纪大惊失色，但还是按照朝廷上的礼仪，叩头谢恩。乾隆洋洋得意，心想好戏就要上场了。过了一会儿，纪又回到乾隆面前，乾隆做出大怒的样子，对纪说：“你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要抗旨不遵吗？”纪不慌不忙地说：“臣哪敢抗旨啊，我刚才到了河边，准备投河自尽，这时屈原出现在我的面前，训斥说：我跳河，是因为皇上昏庸无道，无法把我的才能贡献给国家。你现身在盛世，当今皇上又那么英明，怎么能跳河自尽呢？还不快回到皇上身边，为国家尽忠去。臣听了屈原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就又回来了。”乾隆哈哈大笑：“既然屈原让你回来，那就回来吧。”纪晓岚再一（下转第 34 页）



古代皇帝谥号漫谈

在中国古代，皇帝也有外号，就是谥号。

古代皇帝在位时乾纲独断，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地上只有一个皇帝，就是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他的领土，人民都是他的臣子。在这样的人面前，普通人连大声呼吸都不敢，更别说给他取外号了。但臣子还是有一个机会，就是皇帝死后，按照惯例要给他上谥号，而谥号有好有坏，给予的标准是他生前的功业德行。在位时开疆拓土、攘除四夷，则谥号为武，如汉武帝；在位时轻徭薄赋、生聚教训，则谥为文，如汉文帝；生前明察英断则谥为明，如汉明帝；生前行事错乱神人共愤则谥为灵，如楚灵王、汉灵帝，都是些不着调的皇帝；生前广大祖先基业则谥为宣，如汉宣帝；生前软弱可欺则谥为惠，如汉惠帝一直被母

亲吕后压制；生前有志不遂则谥为哀，如汉哀帝，本想积极铲除外戚王家的势力，不料突然挂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有两个人需要特别说明，一个是秦穆公，所谓的春秋五霸之一，本来谥号是缪，行事悖乱的意思。因为他遗嘱将辅佐他打天下的 170 多人殉葬，其中包括很多贤臣，如奄息、仲行、针虎等。《诗经·国风·秦风·黄鸟》有两句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就是悼念他们，意思是说如果可以换回他们的命，即使牺牲一百个人也愿意。后来可能因为秦穆公的功业，而且穆、缪古字音近，才将缪字讹误成穆，最后才得以穆公留名青史，但缪的恶谥一直被后人唠叨；另一个就是赵武灵王，以在中学历史课本里胡服骑射出名，之所以谥号为武、灵两个字，是因为这个人有功有过，既胡服骑射使赵国强大开疆拓土，功业近于周武王；后来在安排继嗣之君却又糊涂昏庸，最后落得饿死沙丘的悲惨下场，行事近于吊死的楚灵王。因而好坏兼谥，最后成为赵武灵王。

现在看来，谥号可能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制度，殷商时期似乎就有，如太甲等。可以十分确定的是周朝，周文王、周武王时期，《尚书》里就有记载。但是谥号也一度中断，始皇帝统一天下后，认为子议父、臣议君不成体统，因而下令废除这个传统，改行始皇帝、二世皇帝、三世等等以至万世的制度。正因为始皇帝的改革，我们今天看不到他的谥号。

中国史上孩子多的七大皇帝



宋徽宗赵佶——80 个子女

宋徽宗赵佶(1082—1135),1100—1126 年在位 25 年。虽是一代帝王,但是爱美人更胜于爱江山。据《宋史》记载,北宋灭亡之前,后宫有美女一万多。徽宗三十二子,三十四女。单凭这份官方的不完全统计,宋徽宗已经毫无悬念地坐稳了历代皇帝中孩子数量最多的头把交椅。

宋徽宗前面生的 32 个儿子中,除了 5 个早殇之外,其他均长大成人封王。但在靖康之难之后,除康王赵构(即后来的南宋创建者宋高宗),包括其接班人——长子赵桓(宋钦宗)在内的诸王,几乎和他一起远离祖国、劳动改造直至客死他乡。而 34 个女儿(称作“帝姬”)中,除了个别早夭或刚出生的,其他不管嫁没嫁人,只要能走的,几乎全部随军北上,有的在金兵进城或押解路上,和其他皇妃宫女等就一起成了金兵淫乐享用对象,一些美貌出众的或年龄稍小的,被整体送到了金人专设的洗衣院后,没有被折磨死的纷纷送给金熙宗及其皇族子弟为妾,史载入金宫侍金熙宗的帝姬至少有六位。

其实,《据靖康稗史笺证·宋俘记》记载,他做俘虏后还是纵情于床第,他的女人们又为他生了十九个孩子,其中“六子八女”是宋徽宗的骨血,而“别有子女五人”则是金人的

种。据《皇朝通志·满洲八旗姓》《黑龙江志稿·氏族》等史料记载,女真后裔中的“伊尔根觉罗”姓,其汉姓即为“赵”,传为宋徽、钦之后。

唐玄宗李隆基——59 个子女

唐玄宗李隆基 (685—762), 712—756 年在位 44 年。史籍记载:唐玄宗一生共有皇子 30 个,女儿 29 个。其中七子早夭而未及封王,所有女儿全部受封公主。他的接班人是第三子李亨,即后来强行即位并遥尊玄宗为“太上皇”的唐肃宗。

细数《新唐书列传第八诸帝公主》中所列玄宗女为三十,而非“玄宗二十九女”。如果按这个说法算的话,唐玄宗应该是 30 子,30 女,合计 60 个孩子。再看《新唐书列传第八诸帝公主懿宗八女》中亦列有普康公主,以是疑普康公主本为唐懿宗女,故其早死后,由其父追封,而宋人修《新唐书》时又误将其再入于玄宗诸女之中。

因此,在此对于唐玄宗的子女数还是按 59 个算吧!

陈宣帝陈頊——儿子就 42 个

陈宣帝陈頊(528—582),南北朝时期陈朝第四位皇帝,569—582 年在位 14 年,庙号“高宗”。史载,陈宣帝光儿子就有 42 个,历朝皇帝最多的记录,估计非他莫属。其中有名字的皇子 39 个,3 个早夭而未留下名字记载。在有

●文史拾趣●

名有姓的 39 个皇子中,得到封王的有 31 个,另有 8 个未及封。但是,史料中尚未发现关于陈宣帝女儿数量的报道,按照他生儿子的水平,估计女儿也不会少。

由于唐朝之前尚没有为公主立传,因此陈宣帝女儿数量不明,但儿子数量之多,估计在历朝历代皇帝中高居榜首不为过。

清圣祖康熙帝——55 个子女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即康熙皇帝。8 岁登基,在位 61 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史载,康熙帝共有子女 55 个,其中儿子 35 个,女儿 20 个。35 个儿子中,有 24 个长大成人获封皇子,另有 11 个早薨未及封;20 个亲生女儿中,只有八个女儿活到成人而受封公主,其他均未活过十四岁而早殇未及封。

明太祖朱元璋——44 个子女

朱元璋(1328—1398),明朝开国皇帝。一生共育有儿子 26 个,女儿 18 个,合计子女共 44 个。其中,第 1 至第 5 子,(包括长子太子朱标、四子燕王朱棣)均由大脚马皇后所生,8 子及其之后各子,均在朱元璋称帝后出生,只有九子、二十六子早殇,其他各子均长大成人并被封王。

18 个女儿,除十女、十三女早夭外,其他 16 女均长大成人、赐封公主名号,下嫁王公贵族子弟或地方官员、部队军官等。

一些史载说,朱元璋有 24 子、16 女,也说得过去。只是没有包括早殇、早夭的二子二女。如果合在一起,还是 44 个。

唐太宗李世民——35 个子女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史载,李世民一生共育有 35 个子女,其中儿子 14 个,女儿

21 个。14 个儿子中,三个早薨,三个过继给叔父楚哀王李智云、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为嗣;原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后因谋反被废,另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其他 7 子为王。但是这 14 个儿子的下场很可悲:除了 3 个早薨外,另有 3 个被杀,3 个自杀,1 个被“幽闭”,两个被废为“庶人”,只有九子李治、十三子李福善终。21 个女儿均封公主名号,其中 2 个出生不久早夭,一个不及出嫁即亡,其他均下嫁子民为妻,有改嫁现象。

魏武帝曹操——至少 32 个子女

曹操(155—220),三国时代魏国的主要缔造者,后来成为魏王。他的儿子曹丕称帝之后,因为尊敬他,追封他为魏武帝。尽管他在世时,没有称帝,但是鉴于他的影响力和生育力,还是把他列入其中。

史载,曹操一生至少共有子女 32 个,其中儿子 25 个,女儿 7 个。其中早薨的儿子有 9 个(包括神童曹冲也就 13 岁即英年早逝),成人的 16 个儿子中,长子曹昂为张绣所杀,三子曹丕承继丞相与魏王位而后称帝,其他在魏文帝或魏明帝时均被封王(11 人,包括大家熟悉的曹植、曹彰)、封侯(3 人)。史书中有记载的曹操女儿只有 7 个,《后汉书·献帝纪》载,大一点的三个女儿都嫁给汉献帝;在《魏志荀彧传》《魏志曹真传引魏末传》《魏志夏侯敦传引魏略》《魏志司马芝传》还记载了另外四个女儿,其中清河长公主嫁给了夏侯惇的儿子夏侯懋。但是,曹操到底生了多少女儿,有多少早夭的,有多少长大成人的,尚未发现其他记载。

综上所述,曹操至少有 32 个子女。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采取多种方式征求意见

近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落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好“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要求,采取实地查看、座谈交流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在党组书记、主任曹永辉带领下,分别赴周至、户县、阎良、临潼等区县,一是听取本办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在修身做人、用权律己、干事创业等方面的不严不实问题;二是听取本办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在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三

是听取各区县地方志办公室对贯彻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的思路、举措和成效,了解当前区县地方志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与此同时,还组织市级相关修志部门代表、部分区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征求对我市修志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以上措施,为下一步开好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打好基础,为下一步安排部署全市地方志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开展党建帮扶·文化下乡活动

11月20日下午,在凛冽的寒风中由中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机关总支组织开展的“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党建帮扶·文化下乡”活动如期举行。这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有关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机关党员干部深入农村、深入基层的一次学习锻炼,更是一次机关与农村、干部与群众的零距离接触、最直接互动。

此项活动得到了我办全体党员的响应,大家在积极参与活动的同时,踊跃为村民捐

赠图书。此项活动同时也得到了市直机关干部艺术团的大力支持,他们在给村民带来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的同时,还有同志为村民捐送了药箱、药品和衣物。活动当天,我办班子全体成员在党组书记、主任曹永辉的带领下,与石井镇领导和村干部一起深入村民家中进行家访,详细询问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并慰问了3户困难群众,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关注,让广大村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政策的温暖。为了确

●志鉴动态●

保村委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前期调研中了解到村里缺少文体器材、村民文化娱乐生活单调的情况后,我办为村里购置了3套锣鼓以及篮球、乒乓球等部分体育器材,捐赠了412册图书;了解到村委会办公室缺少办公电脑、制度还不够完善的情况后,我办为村里捐赠了3台电脑,制作了10块党建制度牌,并帮助完成了制度上墙。

为了进一步营造和谐的氛围、振奋大家的精神,我办全体人员和市直机关干部艺术团的50多位同志与潭峪河村村民一起互动,同台表演了独唱、二重唱、合唱、舞蹈、独角戏、乐器演奏、广场舞、秦腔等15个精彩节目,我办班子成员带头参与其中,曹永辉主任参加大合唱《茉莉花》《四渡赤水出奇兵》,姚敏杰副主任独唱《父老乡亲》,张帜副主任则与搭档献上了自弹钢琴和吉他伴奏的男女声二重唱《当你老了》《外面的世界》。整台演出受到了广大村民的热烈欢迎,切实达到了“同

演同乐”的目的,为村里开展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正如潭峪河村党支部书记刘永杰所说,此次党建帮扶及文化下乡活动,使农村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了对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坚定了对农村生活水平不断进步的信心,树立了“热爱运动、热爱读书、热爱文艺”的思想认识,是村民提振精神风貌的良好开端。参加这次活动的市直机关干部艺术团的成员高兴地说,通过这种形式开展党建帮扶活动,真诚务实、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接地气、有意义,在我市市级机关中尚属首次,有必要在其他部门和单位宣传推广。

下一步,我办将再接再厉,继续贯彻落实好省市委有关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好我办作为市级机关的职能作用,发挥好我办驻村“第一书记”的桥梁纽带作用,切实完成好协助潭峪河村抓党建、破难题、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的帮扶任务。

2015年《西安年鉴》培训会议召开

11月26日,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2015年《西安年鉴》培训会议”如期召开。来自各区(县)、开发区、市级机关及驻市各有关单位的130余名年鉴撰稿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年鉴处处长姚文东主持。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西安年鉴》常务副主编姚敏杰出席会议并做动员讲话,他指出:《西安年鉴》要抓住《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颁布实施的重要机遇,从强化年鉴公共服务意识、提供更加丰

满的内容资料、推动年鉴变革与发展三方面进一步努力,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为民办鉴,记民喜忧,替民说话,突出年鉴的社会价值和实用价值,并顺应时代变革,加快网络年鉴探索步伐。同时,各区县要积极行动,努力实现2018年全市区县综合年鉴全覆盖。

会议还邀请陕西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原主任、编审张卫东就年鉴撰稿进行授课;副主编姚文东就年鉴条目编写进行培训。



《西安年鉴》(2015 卷) 正式出版发行

《西安年鉴(2015)》于 2015 年 10 月按时出版,全面、客观、系统地记录了 2014 年全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新成就、新经验,为社会各界暨海外人士了解、研究西安提供了翔实的基本资料。全书共有正文 347 面,版面字数 90 万字,彩页 56 面,照片 184 张,类目 37 个,分目 177 个,二级分目 16 个,条目 1606 个。采用分类编辑法,大部分

栏目设“类目—分目—条目”3 个层次,“农林牧渔业”“工业·信息产业”“交通运输业·邮政快递”“财政·税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5 个类目设有二级分目。设有中文目录、英文目录、索引三种检索途径,目录在卷前,索引在卷尾。同时出有电子版(光盘)、网络版,电子版随书附赠;网络版可登陆西安地情网(网址:<http://www.xadqw.cn>)免费浏览下载。

《北张村纪事》正式出版



《北张村纪事》一书是我市村志村史编纂的又一成果,该书采用编年章节,集历史沿革、农业生产、手工造纸、教育卫生、文化艺术、民情风俗等十方面内容,全面记述长安区北张村的历史和现状。全书 25 万字,图文并茂,文中图片、碑匾、碑文都来之村民和档案馆的收藏,多为首次亮相。该书主编邹圣周、张鸿济、蓝信鼎,于 2015 年 6 月由西安出版社正式出版。

《周宋村志》 出版

一部详实记述 500 年村落人文历史的《周宋村志》近日正式出版。该村志经雁塔区地方志办公室认真评审,经西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严格审批。全志有 3 篇 48 章,60 万字,是目前我市已出版村志中,内容较详实、体例较规范的一部。该志图文并茂,收录的历史照片和近现代照片有 400 多幅,其中有现在每家每户的“全家福”。

“五经”何以成为汉代的普及读本

“五经”成为汉代的普及读本，与“四书”是明清两朝的普及读本是同一个原理，因为科举和仕途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不仅仅是国家人才的成长道路，还是穷门小户的希望之光和生活出路。底层人家的孩子，通过苦读书，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还可能娶皇帝的闺女。

汉代还没有科举考试，是察举制，也就是推荐制。汉武帝时期的推荐标准是，“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在汉代，文学一词比今天含义厚实。“有好文学”者，有写作的一面，但更多指好读书，且能从中读出学问的。政审标准是“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发现这样的人才后，“令相长丞”（县令、侯相、县长、县丞）要上报给“二千石”（郡守及诸王相这种级别的工资是“二千石”）。“二千石”考察通过后，要带着考生，还有具体的推荐者进京，到太常处报到。太常是九卿之首，掌管国家礼仪、宗律、天地祭祀，还分管文化教育。入门太常后，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读通一艺（汉代六艺指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乐经），“补文学掌故缺”，文学和掌故均是官职，也相当于学位。考得好的选为郎中，“太常籍奏”，指进入

国管后备干部序列。“既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中特别突出的，直接奏报皇上，告示天下。汉代选拔人才的机制，同时还有退出机制，“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连一本经都读不通的，劝退，再递补另选。汉代不说“博览群书”这样的浮夸话，讲究读通读透。公孙弘是汉武帝时的丞相，也是《春秋》研究的专家，还是人才选拔和退出机制的顶层设计人。

当时也鼓励低级别官吏读五经。不读书的文官，基本上没有晋升的机会。当年的官场，读五经成为一时的风尚。

汉武帝在国家人才选拔主渠道外，还设置有更高层次的学术机构，设置博士官，相当于今天的科学院。博士官招研究生，“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博士弟子是要精通“五经”的。“复其身”是很高的待遇，一般官员都享受不到，终生免税赋。武帝之后，汉昭帝“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之”，汉宣帝“增倍之”。汉元帝时增为一千人，而且“能通一经者皆复”，通一经，就可以终生免税赋。到了汉成帝时期，“增弟子员三千人”。读通一门经，就可以光耀门第，还可以终身免税赋，这对普通人家是多么具体的诱惑和鼓励。

从汉武帝到汉平帝，百余年形成的浓郁的文风和学风，在于“禄利之路然也”，是政府的“禄”和“利”起了实际功用。

中国姓氏 3000 余个,常见姓氏 300 余个,排名居前的百家大姓的人口达 11 亿左右,约占全国总人数的 87%,是中国的主体姓氏。剩下的近 2700 个姓氏都是小姓,“人口蛋糕”就那么小,如此多小姓来分,自然不够分,一些小姓被淘汰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古代一些贵姓因其稀缺性逐渐成了“濒危”姓氏

古代先秦时期,姓氏一般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子女只能另立门户。像夏、商、周三代的国姓分别是姁、子和姬,现在都十分罕见了。从这些贵姓衍化出的姓氏有很多,像姁姓衍化出夏、曾、鲍、欧阳、夏侯等姓氏;子姓衍化出汤、殷、商、林、王、孙等 173 个姓氏;姬姓衍化出的姓氏就更多了。曾经的辉煌不代表什么,这些贵姓最终还是衰落了。

复姓衍化为单姓

有人统计,中国现存复姓有 81 个,历史上曾出现的复姓有许多,这些复姓都去哪里了呢?大多数复姓的衍化,都成了单姓。比如,马姓主要源自马服这个复姓,战国时赵国将军赵奢被封为马服君,其后代就以其封地为姓氏,后来逐渐演变为马姓。许多复姓也是这样的情况,它们或将复姓拆开,或谐音转音,或拆字加部首,衍化为众多的单姓。

此外,历史上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和外来

小姓 易遭淘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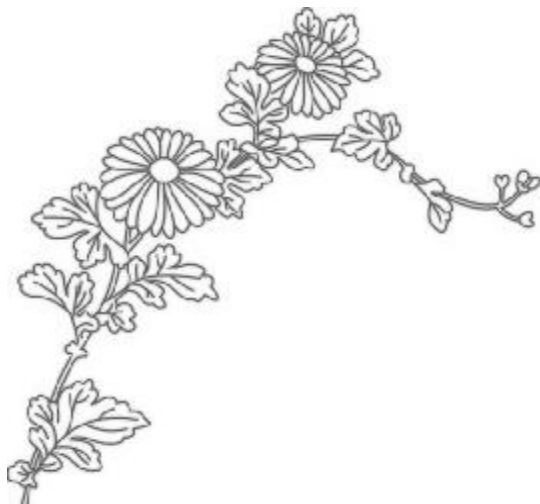
复姓,这其中有鲜卑复姓、西域复姓、契丹复姓、女真复姓、蒙古复姓等,甚至还有来自天竺(印度)、高丽(朝韩)、日本等国的复姓。这些复姓因其民族淡出历史舞台,大多消失了。

忌讳姓氏易消失

中国最古怪的姓氏有难、死、黑、老、毒等,其中难、死是最稀有姓氏,这些字在汉语里都含有不佳意蕴,能够传承下来,都堪称奇迹。古代帝王有给人

赐恶姓的癖好,像武则天就曾给王皇后、萧淑妃、李唐皇室成员改姓蟒、枭、虺、蝮等。

另外,因习俗改变,姓氏有了不佳的含义。像有些动物姓,如猪、蛇、狗等,本来是图腾,到后来这些动物有了侮辱人的意思,也使得姓这些姓的人纷纷改姓。也有的姓氏是因避讳、避祸等原因消失了。



“书香门第”中的“书香”是什么意思

“书香门第”中的“书香”是什么意思？其实原来是古人为了防止蠹虫咬食书籍，便在书中放置一种芸香草，这种草有一种清香之气，夹有这种草的书籍打开之后清香袭人，故而称之为“书香”。

芸香草亦称芸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产于我国西部，有特异的香气，可以入药，嚼之

有辛辣和麻凉的感觉。因为古人常在书籍中放这种草避蠹驱虫，所以除“芸人”指农人，“芸芸”指众多外，与“芸”字有关的词多与书籍有关，如“芸编”指书籍，“芸帐”指书卷，“芸阁”指藏书之阁，“芸署”为藏书之室，“芸香吏”则指校书郎。

魏晋以前 没有「脸」字

魏晋以前的汉字中，是没有“脸”字的，当时表示“脸”意的字是“面”、“颜”等等。其实，人的面部除了耳鼻口眼、额颊腮颌，还哪有脸可言。“脸”字最早出现时，也没有“颜”“面”之意，只是“颜面”上的某个部位。南朝梁武帝《代苏属国妇》诗：“帛上看未终，脸下泪如丝。”其中的“脸”是“脸”的意思，也就是指眼皮。梁·简文帝《妾薄命篇十韵》“玉貌歇红脸，长鬓串翠眉”，还有白居易的《昭君怨》“眉销残黛脸销红”，这里的“脸”都是“颊”的意思，是眼下可以施粉的部位。没有“脸”以前，“面”就是“脸”。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数不胜数。《说文》曰：“面，颜前也。”《汉书·匈奴传上》中的“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后汉书·东夷传·倭》里也有“男子皆黥面纹身”。文中的“面”都是“脸”的意思。至于《三国志·魏志·毛玠传》中的“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的“面”，更是此意。今天还在流传的“面子”、“面红耳赤”、“不看僧面看佛面”中的“面”仍是“脸”的意思。

中国最早的史书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尚书》首次记述了我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件，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时期宝贵的历史资料，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先秦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唐)白居易

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赏析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下面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霍松林教授对此诗的赏析要点。

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写出劳动的艰辛，也得

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一窑一窑地“烧炭”，好不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

●历代诗人咏长安●

就为后面写官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身上衣正单”，自然希望天暖。然而这位卖炭翁是把解决衣食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卖炭得钱”上的，所以他“心忧炭贱愿天寒”，在冻得发抖的时候，一心盼望天气更冷。诗人如此深刻地理解卖炭翁的艰难处境和复杂的内心活动，只用十多个字就如此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又用“可怜”两字倾注了无限同情，催人泪下。

这两句诗，从章法上看，是从前半篇向后半篇过渡的桥梁。“心忧炭贱愿天寒”，实际上是期待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夜来城外一尺雪”，这场大雪总算盼到了！也就不再“心忧炭贱”了！“天子脚下”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们为了取暖，不会在微不足道的炭价上斤斤计较。当卖炭翁“晓驾炭车辗冰辙”的时候，占据着他的全部心灵的，不是埋怨冰雪的道路多么难走，而是盘算着那“一车炭”能卖多少钱，换来多少衣和食。要是在小说家笔下，是可以写很多笔墨写卖炭翁一路上的心理活动的，而诗人却一句也没有写，这因为他在前面已经给读者开拓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

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一车炭、盼到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卖炭得钱换衣食，结果却遇上了“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宫使”。在皇宫的使者面前，在皇帝的文书和敕令面前，跟着那“叱牛”声，卖炭翁在从“伐薪”“烧炭”“愿天寒”“驾炭车”“辗冰辙”，直到“泥中歇”的漫长过程中所盘算的一切、所希望的一切，全都化为泡影。

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

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艺术上也很有特色。诗人以“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两句展现了几近于生活绝境的老翁所能有的唯一希望。这是全诗的诗眼。其他一切描写，都集中于这个诗眼。在表现手法上，则灵活地运用了陪衬和反衬。以“两鬓苍苍”突出年迈，以“满面尘灰烟火色”突出“伐薪、烧炭”的艰辛，再以荒凉险恶的南山作陪衬，老翁的命运就更激起了人们的同情。而这一切，正反衬出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卖炭得钱，买衣买食。老翁“衣正单”，再以夜来的“一尺雪”和路上的“冰辙”作陪衬，使人更感到老翁的“可怜”。而这一切，正反衬了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天寒炭贵，可以多换些衣和食。接下去，“牛困人饥”和“翩翩两骑”，反衬出劳动者与统治者境遇的悬殊；“一车炭，千余斤”和“半匹红纱一丈绫”，反衬出“宫市”掠夺的残酷。而就全诗来说，前面表现希望之火的炽烈，正是为了反衬后面希望化为泡影的可悲可痛。

这篇诗没有像《新乐府》中的有些篇那样“卒章显其志”，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这首诗千百年来万口传诵，并不是偶然的。

尊敬的褚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因未加入微信群，不能与同学们交流互动，深表歉意。

聚会之后，同学间的感怀之情非但未消，反而陡增，于是作《兴会在秋季》一文来自谴，亦分送各位，权当再得一次畅叙良机，更聊表同学之间一份珍重情谊。

受笔力和篇幅限制，多数同学不能展开描写，又尽力想将老师和每位同学全都付诸文字，就多用“打包”之法来归类，这样，不少同学的位置就安排得并不恰当，且多有委屈之嫌。既是同学兴会，笔调上难免调侃多于郑重，人为制造出无端亦无辜的“冤案”来。故这里一并致歉，诚请海涵。

顺祝

健康幸福！

田周民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兴会在秋季

◎ 田周民

重九的日子，该约几位同学好友登乐游原望远，或去东篱下采菊才好，可电波里一条“同学聚会”的短信，犹如磁帚挥扫沙滩，将我们学院早已沙散无踪的一班同学，不仅吸引出世，还紧紧聚在一起。

得此天降佳音那一刻，我没有半点迟疑，就将先前的“登高意向”一尽抛却，直接给出一个“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回应。原以为冲动如我者不会有人，哪料聚会前夜，微信群里显示的“肯定性”统计结果让人喜出望外。全班五十名同学，除一人中途退学失联，两人不幸早歿，四十七人全部找到下落。其中三分之一销声匿迹三十年，首度被“扫”了回来，更多的“落荒者”也正在迷途问

路。像景书信，这位游走于江湖的独行侠，似乎塞满一腔“有家难归”的离愁别恨，如今竟也叩响久违了的“家门”。董崇让、王长生等，虽是有恙卧床人，却无一不在微信群里发出“定来赴会！”的回响。贞学毛、魏影几位还将各自从京、沪提前半月预购好的车票、机票发在群里，以示“我意已决”的不争。看来这相见恨晚的一聚，晚得还算是个时候。毕竟弹指一挥三十年，三十年的风雨已把昔日一群追梦学子变成早生华发的多情应笑之人。

就我而言，聚会的日子确定后，屈指掐算间，心中不觉就生出恨不策着金乌早落，喝着星辰速退的焦急与激动。不知要怨光阴似箭，还是去恨白驹如龟，甚至更平添出“近乡情更

怯,不敢问来人”的恐惧。这种无以比拟的矛盾心情一直将我煎熬到聚会那日。而这“煎熬”一朝在现实中释然,回望怀旧、畅叙慨叹的幻与真、昨与今,全部成了新镜与旧片的切换,一切尽在今是而昨非的往复比照中,将人从记忆的幽隧推进又拖出,拖出复推进,全不晓今夕何夕了。

那时候,被历史点穴的高考制度刚刚解禁,历十冬严寒再迎来尽可以舒筋活骨的春天,一代拣尽寒枝的彷徨者,终于等得“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谁不是“欲上青天览明月”的跃跃欲试呢?可是萧关侯骑,功夫尽在盘马弯弓。我们原本就缺乏扎实训练,在几年前走出中学校门那阵,就如蔽履而弃的钢笔、课本,早是尘满面、冷如霜。如今俯首再拾,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感慨。相顾之下,虽不至于“泪千行”,但“平添出,多少惆怅”却是真的。即便临阵磨枪,把鸣镝飞尽,也只是徒手而归,这残酷的现实简直像无言的冷嘲。手持霹雳弦惊之弓,我们一霎间清醒过来且掂出了自己的份量。只是,心中那一缕“不甘”的自省像催生剂,强行要把孕育超期的理想之婴催生而出。然而,我们不能总上演“空占产房惹人嫌”的悲剧。敛起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鲁莽,效法达摩面壁以修内功,才是明智之举。当时的情形大概有几分“动了真”的感人,所以不时可闻“有崇高理想”的称道声,言者或许无心,可有意的听者却获得无穷鼓励。三十年之后再回味这颇具鞭策的褒词,心存感激之下也说句老实话,当时只道是寻常。若说“有理想”,稍能切题,若用“崇高”来修饰,未免言重。那时,我们似乎没有这个境界,只知

要战胜自己,总认为,在我们虚拟的花园里踞着真实的雄狮。幸亏后来的事实求证了当初的假设,万物复苏,睡狮初醒,我们的理想之婴终于落草。按说,怀抱这虽不算壮实却一样可爱的婴孩该欣然而笑才对,可我们毕竟跨过了狂妄期,尝过了黄连味,当欣慰充满心头,自知微笑绽放的终是一张“老童生”的沧桑面,所以就没有慈恩塔下题名者的得意,当然并不排除“老三届”那一拨“战神”型的学长,他们应该是高考殿堂上闲庭信步的娇子,鬼使神差,却掺和进我们的队列。非等量级的较量,有点田忌赛马的味道,在追逐知识的竞技场上,龟兔赛跑的童话因了他们,全演绎成一道奇妙景观,以至传为校园佳话。

浪子回头,面对那几十门高深莫测的功课,发怵莫过于高数和英语,几个单元考下来,初入校园的自幸加自负立即兑换成了失魂又落魄。记忆犹新的是那门《概率论》,简直横看成岭侧成峰,那云深不知处的折磨,让奋力攀爬的“乌龟”悟到咬牙切齿也无可奈何,而逍遥的“兔子”居然有闲来踱步看菊花的逸兴。像柴俊武、李长发、张永吉、樊武智、施海若他们,抑扬顿挫那不加休止符的无韵之绝唱,就像国文的师爷在哼现代的儿歌,羡慕得我们几失嫉妒之态。多少时候,又不得不捧着听不清也辨不明的难题到他们桌前不耻上问,竟发现人家正潜心于华罗庚《数论》的演算,直骇得我们要打嗝跌坐墩。罗志鹏、杨新生的英语也一样,我们是课堂提问时不将“英雄”的头颅埋进书桌就算王者气概,可他们却抱着外院的教材跟授课老师来比肩。不过,水平参差、年龄不齐也并不全是坏事,那些和华

氏神交、与老师比肩的“兔子”，笑看“乌龟”踉跄而爬不过是善意的恶搞，很快便来结队帮扶，他们或摇旗号呼以鼓劲，或连拉带拖以给力，这让我们立即又找到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释然。我后边排的樊武智，邻桌的柴俊武，给我做老师的成分远大于当同学的机会，而源自应届的学弟如我的同桌张双相、榆林才童刘德锦则另有一种可爱相。他们敢在学长的砺石上磨自己的锋刃，也敢在无人能下手处试刀，做起那些难题来，自有庖丁初试小牛刀的玩味。譬如双相，我一旦迷途问路，他常常连思索都不用，转过身提笔在草纸上，就“这样、这样”地给你比划，三下五除二，一道难题就轻而易举给解决了。这情景，今日想起仍感怀不已。

思想上追求进步，也是那一茬学子的普遍心态。五十人的班集体一朝形成，党支部、班委会、团支部同时建立，人员、制度一齐到位，工作也随之展开，管理更跟着推进。很快地，争当五好学员、争拔流动红旗、争创学雷锋标兵等一系列活动像杂花生树，烂漫了一园春色。其时，最为活跃莫过于党建工作，它的思想动员、组织引导、学习帮扶、先锋模范作用，立即形成一个颇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核心，没过多久，一份份入党申请书就像枫林红叶，蔚然飘成一道风景。党支部触景生情，托叶寻枝，不但指派了得力的培养联系人来重点护理，还掐枝打杈，校正曲直。一年之后，就培养接收了首批预备党员。前浪既起、后浪紧追，我就是那时站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拳。这次相聚，我当年的培养联系人、入党介绍人、支部谈话人，兴之所至，都跟我回顾起当时的情

景，贾学华甚至还能复述出他在我入党志愿书上的签署意见，这着实令人惊叹。

生活上那时更像一个大家庭。班主任褚老师最具慈严兼济的母怀。其严，在开学第一天的班会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强调校纪校规严肃性时那音容神态，至今想起，仍犹如昨。可是更多的还是慈爱的温暖如沐春风。早晨跑操、晚上自习，身前背后都伴有她的身影。寒暑假离校，褚老师会来教室和宿舍楼前挥手相送；收假再回，她又穿梭于这两点之间，把我们迎接。不曾设想，三十载岁月风霜，竟将当年为我们这一片天地立心的典雅之师雕蚀成银发苍苍的迟暮老妪，这，不能不让我们怨恨起岁月的无情。

同学间的友爱也愈日俱深。相逢是五湖四海，开口是南腔北调，就因为一场高考，不仅缘结萍水，情结永恒，而且其时愈久，其情愈浓。那时候，我们上课同窗，用餐同堂，健身同场，课余散步也是同路之人。学习上先进帮后进，学弟要感谢学长课下辅导的关爱；学长却也有求于学弟的时候。他们普遍是学习压力不大，家庭压力不小，三夏三秋，家在农村的要告假回家，收割耕种，返校后课堂笔记的追补又颠倒过来向学弟伸手。能让他们大致完整誊走自己的笔记，学弟们趁机也收获了一份偿还人情债的快乐。

宿舍是十人一“大套”，五人一斗室，可是拖地板、擦桌椅、打水、倒垃圾这类举手之劳竟是年龄无分大小，长幼不论顺序，争抢着来干，那情形颇有点大家君子的风范。按说睡眠习惯人各有习，不能勉强，譬如有人须早眠，有人要晚睡，有人头一落枕就要打开床头灯

向书中寻乐趣，有人则一上床便旋开袖珍收音机听热闹，更有一入梦乡就鼾声如雷者，那可惧的人籁之呼噜早盖过了难得的天籁之岑寂。可是说来也怪，一切都似在常理中，就如从家中带来风味小吃一样，摊在一起，共同分享，食者自食，酣者自怡，谁都乐在其中。倒是女生宿舍复习迎考一事不仅在班上，也在校园传为美谈。那时校园正翻卷着比考分、攀名次的风潮，以性别论，女生尤甚。晚自习结束，总要值日老师和班干部合力催逼，教室的清场才能奏效。长此以往，也难免产生逆反效应，后来学校索性修改了值日制度，将每日早操时打扫教室卫生的时间移至下晚自习的钟声响过之后。这一招真灵，一下子就把那些“书痴”逼上了末路，不，是她们掉头一去，上了“梁山”，回到宿舍继续与书为“敌”。可宿舍的熄灯铃响过之后怎么办？“政策”这王者早就在哀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因为“对策”总比政策高出一筹，女生自有陷黑窟以自救的神法，她们干脆钻进被窝，蒙头自欺亦欺人，先打过查房老师的马虎眼，再打开早已备妥的手电筒，在黑夜的浓隧凿洞自照，以满足“书痴”吃书的饕餮之欲。如此瞒天过海之法，看似蒙过了值夜者的凡目，照顾了同室人的入梦，却不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同样也无不漏光的壁。因为每次考试，成绩排行榜一出，分高位显者，男生的不说，女生里总有段义华、杜荣、陈光堃、王光华、史雅丽那几位巾帼，若问缘故，“紧捂明灯下苦心”的秘诀便不胫而走。无须彻查，那跑风漏光的洞隙不在别处，正是作俑者自己并不严实的秀口。这个例子是在说学习的刻苦用功，另一面也显示出一班同学的集

体观念和全局意识是多么感人。

同学之间是如此的维护又珍惜，班干部的姿态和境界就更让人信服和钦佩。仅聚会当天的现场，别看三十年一去杳无音信，那早已浇铸定型的“班魂”却是风采依旧、光华照人。当全体同学就位，班主任褚老师被隆重邀出，班干部的阵容忽如春风吹绽一树梨花，全都出来迎春。这一集体性的自然亮相，猛不防让我们心中再漾起一层激动的涟漪，而他们同时也喜获了三十年一遇的掌声如雷。刘萍、贾学华自然是一个作动员，一个来启幕。跟着是党支书袁生发、班长王玉龙闪亮登场，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也免不了临场发挥，一场颇有情趣、更见秩序的同学联欢会无须序幕，直接就掀起高潮。那种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师生情、同学情的眷恋，还有三十年来的人生慨叹，任由自己来表达，大家或相互问候发于声，或相拥而泣动以情。祝酒的，举起了杯；咏诗的，放开了喉。更有砚田的耕者、艺海的泳者，全成了昨夜不坠之星辰，热闹得只差当年那支中西合璧的自乐班管弦齐发了。会场上，那抛却了年龄的忘情，忘却了岁月的激动，别说我们自己，连成群的服务员也被感染成出水芙蓉，绽放开含露带风的莲花朵朵。

集体性活动，像聚会联欢类的班内之乐，在现场孩子辈的服务员目中，已够精彩绝伦，在我们，却算不得什么“硬盘大菜”。因为，那时候，在全校性的竞赛中夺魁挂冠，早就是我们不陶自醉的“当年勇”，今日再提，似有为老不尊的轻浮之嫌。可是蒿然支走临场服务的“下一代”，叨叙一番“城南旧事”也不无来路反观之乐趣。那时，专业课的统考，其成绩的

排行榜已无须赘言。文体类诸如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出关斩将的战绩,今日忆起仍能添人豪兴。印象最深的是办壁报的出彩。首期出刊,那个魔人眼目的效果就引来多少仰观者的赞叹,而两期办过,曾欲与之一较高下的对手就全都黯然隐去,从此一任我们独领风骚。因为王定成、王玉龙书法的龙蛇已在校园的乾坤里游走成气候;潘茉莉的丹青也妙笔生花,占尽满园风光。待歌咏赛季一到,我们的收获更是框满箩盈,诗朗诵、小合唱、二胡独奏、口琴吹奏、手风琴演奏、单口相声,本就出尽了风头,而李爱花一曲《山丹丹开花》刚一绽放,潘茉莉一支《在希望的田野上》如百灵鸣啭,余音未尽就赢来赛场的掌声一潮掀来,再涌一潮。大概是一鸣惊人的“阳春白雪”夺了先声,后来的竞赛,别的班级就自矮了一头。大多不肯再与我们编为一组,以免迎面接招的难堪。曾记得校园里一度议论纷纷,甚至慨叹:“人物怎么都聚集在他们这一班里。”这饱含“不甘不服”情绪的议论,让言者自言,闻者反而多了一份“自信”的资本。不过这话也并未说错,走出校门三十年,我们都是风雨兼程,无暇旁顾,今日回来再聚,就“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王定成、王玉龙已是谈笑莫言封侯事,搦管转身,直向会稽山下,追慕书圣的清风朗月而去。潘茉莉呢,也幡然顿悟,去一家影视公司的红尘净土重修她的艺术真身了。

若说在文体活动上我们班张扬了一些,那是兴趣广泛所致。图书馆幽静的一隅,却是一窥情趣雅俗的广角。那时我们很少有实力购书来读,校园图书馆就颇受青睐。课余假

日,只要做完作业,大都沉浸其中,陶而醉之。唐新禧、张登科、杜丕清、孙志雄、王亚霞就是那里的常客,他们与书为朋,多缄其口,看上去也是那么儒雅无华。这其中的田旭、朱宝安、高飞行偏好文学,校园里常见他们夹起书本,行走于阅览室、教室和宿舍间的小道上,或干脆默坐于花坛树荫下若有所思的身影,那施施然的样子颇有点书卷气,又借还守信、惜书如金,深得图书管理员的赞许。可也有几位只顾读书不顾还的。他们一样嗜书如命,在阅览室里既读且摘,摘之不及还要带走,以防下次被人抢先或觅之不见。由于总是不能按时归还,弄得不但管理者提示又警告,还落下“刘备借荆州”的臭名,成为校园里见笑我们的噱头,若说“劣迹”,这可算一斑。要命的是那几位借书者依然我顾,只要借到中意之书,该读的读,该抄的抄。那气壮如牛的理由便是:不就是延期还上吗?又不是赖书不还,用得着如此较真。所以并不在意,好的段落、尤其是好的诗句,不仅自己要摘抄,还不忘荐给志趣相投者一同分享。

说到诗,就不能不提及冯小平。他在课余,除了偶上篮球场“疯”一阵,几乎全潜进书的深海,滔滔的辩论也影响不到他的静思。而一旦有新诗诞生,自吟不够,还诵给“知音”来鉴赏。所以,很快就赢得了“李杜白”的雅名。这次同学聚会,他本就是被搜之“狐”,一经被搜出,就活跃起来,还未见面就先在微信群里吟诗一首又一首,而且全是颇见功力的古体诗。待到聚会之日,更是主动登台,大献诗艺,最震撼莫过于那首把全班同学姓名都镶嵌其中的藏头巨制,诗未咏毕,掌声已是惊涛拍

岸，几乎要将吟咏者连同激赏者自己一起吞噬。更厉害的是聚会散场的当晚，他留下来跟我长叙，兴致处，竟作了一首“七步诗”给我开眼：“母校依旧在，同学又天涯。今夜共谁语，思接你我他。”那反剪双手、潇洒信走的步态呼应着自信又自得的表情，真有点“恨不当年，把曹植笑看”的味道。

好思辨也是我们班上的一道风景。茹俊龙、冯汉平、刘知民、刘治春，这几位简直就是春秋战国的纵横家转世。在不少人看来，那一堆繁重无比的课后作业已经够人打理，他们却视为消遣，主要的精力竟放在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辩论上。一个观点、一个名词甚至一个事件的时代背景、一个数学模型的设计方案，都足以成为激辩的导火索。有趣的是这个群体从无稳定的阵容，此问题的辩论还是一致对外的战斗堡垒，彼辩论一换题目，阵容立即哗然巨变，原先一个坚不可摧的团队很可能就变为堡垒里短兵相接的战斗。辩论的地点也无定数，似乎以晚自习的教室和拥挤不堪的宿舍为主阵地，情急时，课间休息，室外古槐荫下说不定也是打短平快的战场。他们的辩论颇有气势，都是一副真理在握、非我莫属的架势，所辨问题的绣球一旦抛出，彩楼下人人都是薛平贵，不同的是“抢彩”的阵容泾渭分明，毫不含糊。乐了，那哄堂大笑之声会感染得貌似“场外”的不闻不问者，不能不成为不闻不笑者。其实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场外客”并非无意去激辩的风浪中弄潮显威，只是苦于时间不允，或“体力”不济，但只要你仍在海边走，激辩的浪潮不知哪会儿就卷来一螺一贝在脚下，不渔而获，何乐不为？我就常从

这样的激辩中得到启发，甚至不声不响就弄清楚一个难缠问题。激辩也常有情急的时候，每当这时，他们人人都是真理的传人，不肯退让半步，面红耳赤、声嘶力竭尚且不够，有人竟要蹲在椅子上跟你拍桌子摔笔，大有雷鸣电闪，骤雨将临之势。可一旦被事实击溃，那就又是一番情景。有人先是哑然失语，继而面面相觑，然后便有一人顿然觉悟地仰天而笑，其他则意会而和。那种以滑稽解尴尬的幽默，让激辩者双方立刻干戈化作玉帛，冰释前嫌，风和日暖起来，旁边欲静而不能的“受灾者”又是因福得福，也正好看场免费喜剧，不意间舒展了锁得太紧的眉头。

这一群辩才中，茹俊龙颇有孟尝君的遗风。一个观点辩明，兴奋之下他多半会将对垒之阵整编为双赢的凯旋之师，再去校外小餐馆庆贺一番。记得八角一瓶的“尖庄”、“小角楼”常是他庆功的“国酒”，每当举杯，他的祝酒词总少不了“往来无异类，怒骂亦同心”一句，颇有江东豪气。他辩论的领域似要比别人广些，还有王涤宇、岳西凡、周德有。这四大才子，激辩的主干上常常斜出一枝，扯出文学的话题。王涤宇有厚实的古文功底，周德有生就是过目不忘的奇才，岳西凡来自旧举人的门庭，迂而不腐的老夫子气不时扑面逼人，茹俊龙则是阅尽古今经典、赏遍中外名篇的饱学之士。这样的话题在他们中间一旦挑开，那热闹的景象不啻旁听一堂精彩的中外文学史。而演讲激辩者此刻的谦谦君子风度全被“文人相轻”的浓氛罩蔽无遗。说到风疾雨骤时，王涤宇会长叹：“茹俊龙，你凭什么总能将你的臭文章悬挂在教室后壁的范文栏里？”周德

有又会讥讽岳西凡：“就你这臭水平，也配在古长安的举院巷里脱胎换骨。”茹俊龙呢，先帮周德有对付岳西凡，再腾出手来专攻王涤宇。见来者不善，王涤宇且退且却，又不防点破对手的“死穴”：“早看透你围魏救赵这点小把戏，来，攻吧。”见王涤宇要鸣金息鼓，茹俊龙却穷追猛打，并不罢休，以胜者王侯的口气再将一军：“不信？看看下次的作文还怎么高悬在范文栏里。”不等这厢接招，岳西凡猝不及防斜刺而入：“茹俊龙，就你能，别人都不行，拿那本英文版的莎士比亚诗集来，叫他跟罗志鹏比朗诵。”这一招直把眼看着就要稳操胜券的茹俊龙又逼到擂台的悬崖边。激辩到了这种忽儿电光石火，险象环生；忽儿又腾蛟起凤，绝处逢生的境界，旁观如我者，早被感染得只剩下痴人笑火的能耐了。就是这样令人神往的校园生活，一眨眼就没进了流年岁月的沙海，再要召回，竟是三十年后的仲秋，而且一轮明月也非当初那个“婵娟”了。因为，提笔先表的那两位“早歿”之人，正是奇才周德有、老夫子王涤宇。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他二位，我们今生是无缘相见了。然而聚谈中忆及校园多少难忘情景，尤其是“激辩”的盛况，谁也无法回避周德有、王涤宇的名字，从心中发出“何事长向别时圆”的天问之时，那么多人无不同声询问：“岳西凡究竟有多忙，为什么独他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茹俊龙一听就急了，甚至带着几分躁气说：“这个又臭又硬的茅厕之石，我给他打过一百个电话了，还嘱刘萍、田周民电话短信尽管联系，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回来，结果全不如意。我不相

信生意能把人做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他既如此无视同学情，现在就宣布开除他的同学籍！”话音未落，满场便是捧腹的前仰后合。山水好移，人性难改，三十年过去，这老兄的个性风格丝毫未变，对人对事的态度还是那么率直又纯真。你看他，这就变怒为悲，举起酒来，郑重宣布要提议三杯。这三杯，一杯敬褚老师，先谢她园丁之劳，祝她健康长寿，晚年幸福；一杯敬同学们，今生难得情谊一场缘一场，祝退下岗的保重身体、颐养天年，还在位的本色莫改、心志莫衰；第三杯，他稍有迟疑，似在作情绪的调整。那种“举杯犹狂欲语谁”的难抑之情看得人顿生屏息之感，然而酒杯还是被他高高举起，而且直呼：“周德有、王涤宇，同学们敬你二位了，你们一路走好！”语音既落，杯中苦酒也一饮而尽。就是这三杯高敬之酒，使原本热烈的气氛瞬间凝滞，满座欢颜亦成鼻酸眼热之相。

造化总让事物呈现两极态势，另一个群体的表现却让人感动得难以自抑。或许聚会对他们另有一层意义，因为他们的表现让人不得不先说说聚会活动的起因。这次聚会，发端于核心区刘萍等热心同学的倡议组织，而实施的过程谁也没有想到竟成了“搜孤”的苦旅。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微信群，加入者不过是核心区三分之一不到的活跃分子，倡议发出，人群的无须多说。群外之“狐”的搜索，难度之大，与日俱增，待搜出三十个左右时，搜寻者心中的激动因为“雪拥蓝关”而平添了一层焦虑。好多人不是无从联系，便是换了手机，这让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踏破芒鞋。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所幸被搜出者感动之下也加入

了搜寻的行列。也只有被“搜”出者变为“搜寻者”的时候，大家才倍感组织这场活动的不易，故而对刘萍她们的创举愈是往后愈是称颂有加，赞不绝口。有一首诗这样写道：“秋来也，雁阵南飞。问头雁是谁？刘萍、刘萍，海若、刘议相随。一个前拾遗，一个后补缺。直叫这，卅年一聚，匆匆之会，人人乘兴来，个个满意归。”正是为了大家这个“满意”，在刘萍的推动下，“搜狐”的雪球才越滚越大。而在这滚与推的过程中，我们隐约有了异样的感觉，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诗中所谓的“满意”，带给常人的，只需精神接受便能得到；那对于另一群“非常之人”，就须以惊人意志的支撑才可换取。因为，这么一直往下寻觅的漫漫长路上，我们已经清楚，除了两位“早歿”者的背影渐行渐远，竟还有好几位早在苦等的卧病者，是在苦等同学们可遇不可求的一聚吗？没错，命运陷他们于困境，“苦等”又让他们雪上加霜。有人就曾说：“我若身体允许，早就组织这场活动了”。所以这次活动，对于这些同学来说无异一剂解药。一听到聚会的消息，他们的本能反应便是以飞信传情表意，而且愿望是那么强烈，心情是那么迫切。大概是这几位卧床人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举动太过感人，让鼓动者反受感动而变成劝慰者——为了同学的身体，决然重修了“一个都不能少”的计划。可是劝归劝，行归行，真的到了聚会这日，被“劝告静休”的几位难友，居然以别样方式带来一堂惊喜。

魏影就是带来惊喜第一人。聚会通知她不一定最先收悉，却是最先响应。可能是沸腾的热血过于滚烫，让她临行前的行止全受制

于归心似箭的冲动了，结果一不小心竟跌伤了腿，疼痛使她寝食难安，尤恐耽误聚会行程的自责更让她追悔莫及。然而她还是痛下决心，不仅将提前预购的车票发在微信群里，还提前一天赶来，而且是瘸着病腿。这真是际会的风云将涌未涌，她先掀起一潮。

盖晓霞，这位沉痾在身匿迹十年有余的阆中仙葩，那日突然揭起盖头，闪亮在聚会的现场。她是同学中最早罹患重症的不幸人，依稀记得在她卧病之初，一帮知情者就几欲登门看望，却总被她婉言谢绝，后来干脆反攻为守恳请大家理解她的不见之隐。如此以来，我们不得不把见面看望换成默默祈祷，以至于有谁再问，我们便自觉地相互提醒，到了“不敢高声语”的程度，可是从此也渐渐失去了音信。这一次，可谓是东山日头西边出，她是非到不可，而且开口就说：“是同学聚会的消息给了我走出家门的力量和信心。”她进门的那一刻，或许是由于春容秋改，让人惊诧于岁月这神偷偷容换颜的魔法，也或许是因为病中悟道让她更见淡定绰约，总之，似曾相识又岂止相识的感觉让在场的我们惊出一片“哇”声。女生是下意识地地上前就抱作一团，泪飞顿作的倾盆之雨，久久化不开因情而结的一个“人团儿”，让欲献殷勤的男生只好傻在一边，似要等到地老天荒。如果说魏影的那一潮是前奏，盖晓霞的出现，引来泪雨的洪峰汹涌而至，才是三十年同学情再现的第一潮。

接着是王长生。他摇着蹒跚步履出现了。这位不听劝阻的笑佛，抱定了非来不可的决心，作难自然是他的贤妻。那位来而未面的默默护送者送她的病中人至会场，交给同乡吴

都盈,再悄然而返。这在我们知情那一刻,简直把“守口如瓶”到不可理喻的“吴老先生”抱怨到千夫所指的地步。记忆中的王长生总给人以喜相,今日再见,未变的是弥勒的笑容,变了的是他举步维艰的步态,这不可设想的人生乖舛,在扶他入席的时候,看得出,大家的笑靥里无不隐然渗出许多苦涩。

下一位是蒋增民。他是我在组织发展前期的培养联系人,这些年来基本保持着联系。得知他有病卧床,约在一年之前,总说去探望,却因北上之路迢迢,加之一次次美好的愿景全经不住无由之由的黑掉,故而至今尚未成行。都说他不便出门,却也突然抱病临场,给人一个猝然不及的惊喜。他的气色看上去不错,状态也比想象要好些,大家近来常牵挂着这位校园运动场上的全能健将,无人相信病魔会跟他纠缠不休,可事实却摆在那里,让人无话可说。这时相见,仅是观气色、望神态,迎他进门的一瞬,我们的心也都大了不少。男生终究不似女生,在似悲犹喜的场面上总能显出随机应变的优势,不是上前用一记看似来势汹汹、实则虚晃一下的软拳来问候,让你生出未成曲调先有情的温暖,便是正话反说,重拿轻放,以诙谐之趣极尽调侃,让期期艾艾之流也为之解颜。你看,众男生这时早将那群资深淑女“冷”在一边,围定这几位原本不计在聚会之列又无中生有突然现世的“惜惶”之人,那风一句雨一句看似不着边际又造出无穷快乐的特殊问候,即便家人在场,不想捧腹也难。听听,居然有谁临场作诗来取乐:“一声喝断奈何桥,看你过桥去逍遥。尔等若敢上桥去,试看哪个把你饶。”这豪气淋漓,霸气十足

的诗句,别说听得眼前的罹患者为之开怀,阎王听了不笑落手中那管勾魂索魄的狼毫,恐怕也由不得了。不用说,那群抱作一团,哭作一团的女生也早被这一氛围感而染之,在一旁破涕为笑。

别以为聚会的仪式就可以启动,赵淑清又来喊“山门”了。随着“山门”开启,还没待众学友涌出相迎,她竟然睡佛高卧,由她的儿子用硬板床直送了进来。一时间,会场上乱作一团,那个场面,才让人知道什么叫感天地而泣鬼神。真不明白,这位干练泼辣、活泼开朗的高山俊样,怎么就让凶残的腰疾扳倒在床,几乎无法自如起卧了。然而她决不向病魔低头,一知道聚会的确切时间,便在微信群里起誓:“同学们,等着我,爬也要爬到聚会现场和大家见一面。”没想到这位印象中的淑女如今竟让岁月的风霜打磨得如此经风耐寒,她说到做到,还恰是时候地赶到现场。刘萍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消息时,一句话未说完,自先喜极而泣,以至泣不成声。后来才知道赵淑清的这一壮举惹哭了满屋女生,也让所有的男生感佩不已。面对又一次决堤的泪涌,插不上手也插不进口的男生,又如盖晚霞出现那阵,手足无措又无助得似木鸡呆立,令人同情。其实在赵淑清未出现之前,男生的阵营还正为自己轻易就让笑浪盖过了泪浪的技巧而自得,可万没想到,这神助之潮涌得疾也退得快,倒是女生这后浪之来,那么势不可挡又压过了男生的前浪,叠起的高潮这才算真的到了巅峰。男生还有什么可说,全若有所失地回到座位,只能顺着女生的感情脉络一路随波逐流而去。直到聚会仪式开始,一巡酒过后,了过赵淑清

●文苑●

一愿，英雄这才有了用武之地，争先上前，一起将赵淑清送上车去，聊补了心中一憾。我赶到会场，赵淑清早已马过潼关，欲知其情其景，只能从一片钦佩慨叹声中拼接联想的积木。不过，从那么多图案中，让我看见的，不光是赵淑清痛且快乐的身影，还有一个帅小伙的人子形象。

相见时难别亦难。据说赵淑清从来到走，与同学相聚的时间仅一个小时许，而且除了强撑硬坐与同学们合了张影，全是躺着说话。她是嫌自己一直以这样的姿态在场，既添人麻烦，又让人扫兴，故握完手、问过好，就执意要退场。挽留，显然已经不可能；相送，又是那么地不忍，一番踌躇，还是挥手一别吧，也让她少受点折磨。可相送时，那种难舍难分的场景，我不由得在想，这聚会若再延迟，真不知我们中间多少人还要憔悴几许？正如袁生发诗云：“千年等一回是神仙，三十年等一回才是人间。”这诗境何其贴切。生身寄人间，人间有大爱，爱以缘而生，缘因爱而在。而那爱、那缘的渊源，在这里，在那里，更在发酵了三十年的同学情谊里。面对这情这景，向来讷于言的李康，也忍不住第一个站出来在微信群里大发感慨：“什么是同学关系？那就是断不开几年里同窗共读的缘分；任时间拷问也从不世故的纯洁；几十年不见，一见仍然如故的真挚。”李康说对了，就是凭着这一层关系，凡是同学，此刻便将手头的一切置于次位、连同生命，全向着这三十年一聚的现场奔来。他的话让我忽然又想起了西凡兄，这位颇重情义的学长，依他那口碑高耸的人缘，聚会的现场若少了我，或许无碍大局，缺了他却不可思议。

因为在这时序与人生交感的秋季，即使人在囵途，若能彻悟“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句，老兄也该回来补一杯“谢罪”酒了。

洒至半酣兴未尽，不觉已到停杯时。窗外，枫叶正红，金菊初绽。一道斜阳激射进不远处的湖中，将天光云影、枫红菊黄一齐漾入盈盈清波，进而铺排成“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气象。摄影师殷勤提示，正是拍照留念的良辰佳机。于是，我们鱼贯而出，先来拍集体合影。站队形时，不经意临湖自照，蓦然回首间，无不感慨秋景无限，人面休矣。可等到照片选定，上前一瞧，“风景这边独好”的格局里，张张粲容虽无青春的荡漾，却也洋溢着“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自幸与自豪，好一个“美”字了得！这美，当然不排除背景陪衬的造化之功，可不谦虚地说，照片中人与秋景的对比，犹如梅与雪的比照，“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我们相聚于酽熟的秋季，烂漫迷人的秋色，有我们涂去的一抹。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2015年10月





11月20日下午，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开展的“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党建帮扶·文化下乡”活动在户县石井镇潭峪河村如期举行。图为市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曹永辉和党组成员、副主任姚敏杰，与石井镇领导和村干部一起深入村民家中进行家访，并慰问3户困难群众。



市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曹永辉讲话



举行捐赠物品交接仪式



方志办全体人员和市直机关干部艺术团的50多位同志与潭峪河村村民互动



村民观看表演



村民表演广场舞



注：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
智者乐，仁者寿。 ——（出自《论语》）

王文魁，80岁，退休前系长安区教育局综合档案室主任。20世纪90年代接触梅花篆字，此后专注练习梅花篆字十余年。其字如梅花，花字融为一体，以篆字为骨架，字体刚劲有力。老人无偿赠字，至今已给100多人送过梅花篆字书法作品，别人都叫他“王雷锋”。2015年7月29日的《西安晚报》曾以《花中有字 字中藏花》进行过报道。